

# 列寧著

## 論民族自決權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七年。莫斯科





# 列寧著

論民族自決權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七年。莫斯科



唯真譯校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 出版局聲明

本版論民族自決權一書，是按莫斯科馬恩列學院一九四六年刊印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所載原文譯出。

爲便利讀者瞭解起見，本書後面附有一些備考性質的簡要註釋。凡列寧自己所加腳註，概未標明註者是誰。



## 目 次

(一) 何謂民族自決？	8
(二) 歷史的具體的問題提法	15
(三) <u>俄國</u> 民族問題底具體特點及 <u>俄國</u> 資產階級民主的 改革	19
(四) 民族問題上的『求實主義』	25
(五) 自由資產階級與社會黨機會主義份子對於民族問 題的態度	33
(六) <u>挪威</u> 脫離 <u>瑞典</u> 而分立	46
(七) 一八九六年 <u>倫敦</u> 國際代表大會底決議	54
(八) 空想的 <u>馬克思</u> 與求實的 <u>盧森堡</u>	60
(九) 一九〇三年的綱領及其取消者	70
(一〇) 結 束 語	82
簡 要 註 釋	88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綱領中論民族自決權的第九條，近來引起了（我們在教育雜誌<sup>1</sup>上已經指出了這一點）機會主義者底大舉攻擊。俄國取消派<sup>2</sup>份子謝科夫斯基在彼得堡取消派報紙上，崩得<sup>3</sup>份子李勃曼以及烏克蘭民族社會黨人尤爾克維奇各在自己的機關刊物上，極力攻擊這一條，用極端鄙視的態度來輕蔑它。機會主義向我們馬克思主義綱領所舉行的這種「總同盟進攻」，顯然是與現時一般民族主義偏向有密切聯系的。因此我們認為現在必須把這個問題詳細分析一下。不過我們要指明一點，就是以上列舉的那些機會主義者中沒有一個人拿出過什麼獨立的論據：他們都只是重複盧森堡<sup>4</sup>在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間用波蘭文寫的那篇標題為民族問題與自治的長文內所說過的議論。所以我們在這篇論文中所要予以最多注意的，也就是盧森堡底「新奇」論據。

## (一) 何謂民族自決？

要想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研究所謂自決，自然首先就要提出這個問題。所謂自決應當怎樣瞭解呢？是要在從法權「概念」中得出來的法律定義裏面去找答案呢，還是要在對各國民族運動所作的歷史經濟的研究中去找答案呢？

謝科夫斯基，李勃曼和尤爾克維奇一流先生們甚至沒有想到要提出這個問題，而祇以嘲笑馬克思主義綱領「語意不明」來敷衍了事，原是毫不足怪的，因為他們由於頭腦簡單，大概是甚至不知道民族自決問題不僅在一九〇三年通過的俄國黨綱中說到了，而且也在一八九六年倫敦國際大會決議中說到了的事實（我們往下論到這一點時，還要詳細來講）。至於盧森堡，雖屢次宣佈說這一條似乎是太抽象，太有形而上學的弊病，而她自己正犯了這種抽象和形而上學的錯誤，却就奇怪得多了。正是盧森堡經常迷誤於泛談民族自決問題的一般議論（以至於簡直可笑地暢談怎樣去認識民族意志的問題），而從來也沒有明確提出問題：事情本質究竟是在於法律的定義，還是在於全世界民族運動底經驗呢？

確切提出這個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提出的問題，立刻就會把盧森堡底論據打倒十分之九。民族運動並不是初次在俄國發生，也不是俄國一國特有的現象。在全世界上，資本主義澈底戰勝封建制度的時代，總是與民族運動相連的。這種運動底經濟基礎是在於要保證商品生產達到完全勝利，便必須使資產階級奪得國內市場，必須使同一語言的人民所居住的地域用國家的形式團結起來，同時剷除阻碍這種語言發展及在文藝上鞏固起來的一切障礙。語言是最重要的人類交際工具；語言統一及其無阻碍的發展，是保證商品週轉能適應着現代資本主義而真正自由廣泛發展起來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廣泛地劃分爲各個階級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最後，是使市場與所有一切大小經濟主人，賣主及買主密切聯繫起來的條件。

所以組織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這些要求的民族國家，就是一切民族運動底共同趨向。最深刻的經濟因素推動人們來實現這一點，所以民族國家對於整個西歐，而且對於整個文明世界，都是資本主義時代標本的正常的國家形式。

因此，我們要想瞭解民族自決底意義，不去玩弄法律上的定義，不去「發明」抽象的定義，而去研究民族運動底歷史經濟的條件，就必然要得出結論說：所謂民族自決，就是民族脫離外族集體的國家分立，就是組織獨立民族國家。



關於爲什麼只能把自決權瞭解爲國家分立權，而不能瞭解爲任何別的東西的其他各種原因，我們往後再講。現在我們只把盧森堡企圖「推脫」關於成立民族國家的趨向是有深刻經濟原因的這一必然結論的情形，考察一下。

考茨基所著民族性與國際性一書（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新時代第一期副刊，俄譯本載於一九一〇年里加出版的科學思想雜誌上），是盧森堡知道得很清楚的。她知道，考茨基在該書第四節裏詳細分析了民族國家的問題，得出結論說鮑威爾「輕視了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向」（見該書第二三頁）。盧森堡自己引用考茨基所說「民族國家是與現代條件」（即跟資本主義以前的中世紀等等條件不同的資本主義的、文明的、經濟上進步的條件）「最適合的國家形式，是使國家最容易實現其任務的」（即能保證資本主義最自由，廣泛，迅速發展的）「國家形式」等語。這裏還要指出考茨基所作的一個更確當的結論，即認爲民族複雜的國家（即與民族國家不同的所謂多民族國家），「始終是由於某些原因而內部結構不合常態或不夠發展的（落後的）國家」。考茨基所說的不合常態，當然只是指不適合於那些最適應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條件而言。

現在就要問問：盧森堡對於考茨基所作的這些歷史經濟結論，究竟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呢？這些結論正確不正確呢？是考茨基所提出的歷史經濟理論正確呢，還是鮑威爾所提出的那個根本上是心理學式的理論正確呢？鮑威爾所持的那種無疑是「民族機會主義」的立場，他那種擁護民

族文化自治的觀點，他那種民族主義的偏執（如考茨基所說「有些地方強調民族成分」），他那種「極其誇大民族成分而完全忘記國際成分的態度」（考茨基），究竟與他那種輕視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向的態度，有什麼聯繫呢？

盧森堡甚至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她沒有看出這種聯繫。她沒有把鮑威爾理論觀點底整個系統細想一下。她甚至完全沒有把民族問題上的歷史經濟學理論與心理學理論對立起來。她只是用如下一段話來反對考茨基。

「…這個「最好的」民族國家只是一種抽象的東西，容易受到理論上的發揮和理論上的擁護，但不符合於實際情形」（社會民主主義評論<sup>5</sup>一九〇八年第六期，第四九九頁）。

盧森堡爲要證實這個堅決意見，接着就說，資本主義列強的發展和帝國主義，使弱小民族底「自決權」成爲虛幻的東西。「是否可以——盧森堡驚問道——認真說到形式上獨立的門的內哥羅人，保加利亞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瑞士人底「自決」呢；他們的獨立性根本就是「歐洲音樂會」上政治鬥爭和外交把戲底產物哩」？！（第五〇〇頁）。最適合於實際條件的，並「不是考茨基所認定的民族國家，而是強盜國家」。然後她就舉出了說明英法等國所屬殖民地面積大小的幾十個數目字。

看了這些議論，不能不對作者根本不懂何謂牛頭不對馬嘴的本事表示驚訝！用莊嚴的神情教訓考茨基，說什

麼小國家在經濟上依賴於大國家，說什麼資產階級國家爲着用強盜手段去征服異族而互相鬥爭，說什麼存在有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等語，就未免是一種令人發笑的賣弄聰明的幼稚氣，因爲所有這些都與問題毫不相干。豈但小國家，而且例如像俄國這樣的國家，也是在經濟上完全依賴於「富強」資產階級國家底帝國主義財政資本勢力。豈但巴爾幹的幾個叢爾小國，就連十九世紀的美國，在經濟上說也曾是歐洲底殖民地，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sup>6</sup>裏面就已經說過的。所有這些，考茨基和每個馬克思主義者當然知道得十分清楚，但這與民族運動以及民族國家問題是毫不相干的。

盧森堡把資產階級社會裏的民族政治自決問題，民族國家獨立問題，偷換上民族經濟獨立，經濟自主問題。這種聰明說法，正好似一個人討論國會，即人民代表會議在資產階級國家內應有最高權力的這個綱領要求時，却竟發表他認爲大資本在資產階級國家任何一種制度下都擁有最高權力的正確見解一樣。

毫無疑義，世界上人口最密的亞洲，大部分都處於「列強」殖民地的狀況，或是在民族關係上極不獨立極受壓迫國家的狀況。可是，這種盡人皆知的情形，難道能絲毫動搖一件無可爭辯的事實，即在亞洲只有日本一國，就是說只有在這個獨立的民族國家裏，才造成了種種條件來使商品生產能夠最完備發展，使資本主義能夠最自由、廣泛、迅速發展的事實麼？這個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因此它

自己已在壓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亞洲是否來得及在資本主義崩潰以前，也像歐洲那樣形成爲各個獨立民族國家所構成的體系，我們無從知道。但有一點始終是無可爭辯的，就是資本主義把亞洲驚醒起來了的時候，在那裏也是到處都引起了民族運動，而這些運動底趨向是要在亞洲創立一些民族國家，也只有這樣的國家才會保證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好的條件。亞洲底實例，是擁護考茨基，反對盧森堡的。

巴爾幹半島各國底實例也是反對她的，因爲現在誰也看得見，在巴爾幹半島上保證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好的條件，恰巧是隨着這裏建立獨立民族國家而形成起來的。

所以，無論是全體先進文明人類底實例也好，巴爾幹半島底實例也好，亞洲底實例也好，都是與盧森堡所說相反，而證明考茨基立論絕對正確：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底通例與「常態」，而民族複雜的國家，却是一種落後的表現或例外的情形。從民族關係方面看來，民族國家無疑是保證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好的條件。這當然不是說，這種國家在資產階級關係基礎上能排除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這祇是說，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忽視那些產生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向的強大經濟因素。這是說，從歷史和經濟的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綱領上所講的「民族自決」，除了政治自決，國家獨立，建立民族國家而外，便不能有什麼其他的意義。

至於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上



看來，究竟要在什麼條件下，才能贊助「民族國家」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要求，這在下面就要詳細說明。現在，我們祇要闡明「自決」概念底定義，不過還應當指出一點，就是盧森堡知道這個概念（「民族國家」）底內容，而她的那些機會主義伙伴，如李勃曼輩，謝科夫斯基輩，尤爾克維奇輩，却連這一點都不知道哩！

## (二) 歷史的具體的問題提法

馬克思主義理論底絕對要求，就是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都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再則，如果是講到某一國家(例如，講到該國的民族綱領)，就要注意到在同一歷史時代以內該國與其他各國不同的具體特點。

若把馬克思主義底這個絕對要求應用到本問題上來，那就會要怎樣作呢？

首先就必須嚴格分清從民族運動觀點看來根本不同的兩個資本主義時代。一個時代是封建制度與專制制度崩潰的時代，是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社會和國家形成的時代，當時民族運動初次成爲羣衆的運動，使民間一切階級用各種方式，如經過出版物，參加代表機關等等加入政治生活。另一個時代，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全形成，立憲制度早已確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相對抗情形已很發展的時代，這個時代可以叫做資本主義崩潰底前夜。

前一時代底標本現象，就是由於爭取一般政治自由，尤其是爭取民族權利的鬥爭，使民族運動活躍起來，使人數最多而「發動最難」的那個居民階層，即農民，加入這種運動。後一時代底標本現象，就是沒有什麼廣大資產階

級民主運動，當時已很發達的資本主義使完全捲入了商品週轉範圍的各個民族愈益接近，彼此雜居，而把國際上溶合了的資本與國際工人運動互相對抗的情形提到第一位。

這兩個時代，當然不是彼此完全隔絕，而是有無數過渡連環聯繫着的；並且各個國家，因民族發展速度，居民民族成份，居民分佈等等差異而各不相同。若不注意到所有這些一般歷史條件和具體國家條件，就根本無法着手製定該國馬克思主義者底民族綱領。

正是在這裏，我們也就遇到了盧森堡底議論中最軟弱的地方。她在自己的文章裏拚命想出一批「厲害」字眼來反對我們綱領第九條，說它「籠統」「死板」，說它是「形而上學的空談」等等，等等。這位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責形而上學觀點（馬克思所指的那種形而上學觀點，即反辯證法的觀點）和空洞抽象觀點，自然也就應該給我們作出一個用具體歷史方法研究問題的榜樣。問題是講到在一個一定的國家和一個一定的時代，即二十世紀初期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民族綱領。大概盧森堡會這樣提出問題：俄國究竟是處在怎樣一個歷史時代，這個國家在這個時代中的民族問題與民族運動究竟具有怎樣一些具體特點呢？

可是盧森堡絲毫也沒有說到這一點！民族問題在現今歷史時代中的俄國究竟是怎樣擺着，俄國在這方面究竟具有怎樣的特點，——在她的文章裏對於這個問題是根本沒有加以分析的！

人們告訴我們，說巴爾幹民族問題與愛爾蘭不同，說

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具體條件下怎樣怎樣估計過波蘭人與捷克人的民族運動（整頁都是引證馬克思所說的話），說恩格斯怎樣怎樣估計過瑞士各森林州反對奧地利的鬥爭以及一三一五年的摩耳加騰的戰役（整頁都是摘引恩格斯底話與考茨基所加的相當評註），說拉薩爾認為十六世紀德國農民戰爭是反動的等等。

當然不能說這些意見與引證有什麼新奇之處，然而叫讀者再三回憶回憶馬克思，恩格斯與拉薩爾用什麼態度分析過各國具體歷史問題，總是有些益處的。你們閱讀她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裏摘來的這些極有教益的引證，就會特別明顯地看到盧森堡自己陷落到了何等可笑的地位。她用流暢的詞句和憤激的神情，鼓吹說必須用具體歷史方法分析各個時代中各個國家的民族問題，但她絲毫也沒有企圖確定一下，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究竟是處在怎樣的資本主義發展歷史階段，這個國家中的民族問題究竟有怎樣的特點。盧森堡舉出一些表明別人怎樣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問題的例子，就好像是故意指明人們往往用善念去鋪砌地獄，用許多善言去掩飾自己不願意或不善於在實際上利用這些善言的事實。

請看一個很可注意的比擬。盧森堡極力反對波蘭獨立口號時，引證她在一八九三年所寫的一篇證明了「波蘭工業發展」迅速並把工廠製造品推銷於俄國的著作。不消說，從這裏還絲毫也不能得出什麼有關民族自決權問題的結論，而不過證明舊時貴族波蘭已經消滅等等罷了。但

盧森堡總是不知不覺地作出一種結論，說在那些使俄國與波蘭結合起來的因素中，現代資本主義關係底純粹經濟因素現在已佔優勢。

可是，我們的盧森堡談到自治問題時，——雖然她的文章是標題爲一般「民族問題與自治」，——就來證明波蘭王國有特別權利要求自治（參看一九一三年教育雜誌第十二期上對於此點的評論）。爲了證實波蘭有權要求自治，盧森堡就認爲俄國底國家制度——大概是按其經濟、政治、風俗習慣以及社會方面的標誌來說——是構成「亞洲式專制制度」這一概念的種種特徵底總和。（評論，第十二期，第一三七頁）。

大家知道，這種國家制度，當該國經濟完全是以資本主義前期的宗法特徵佔優勢，而商品經濟及階級分化尙很少發展的時候，是極其牢固的。如果在國家制度顯然帶有資本主義前期特質的那個國家內，存在有一個資本主義發展迅速的民族隔絕區域，那末這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愈迅速，則它與資本主義前期國家制度間的矛盾也就愈厲害，而這個先進區域脫離整體也就愈有可能，因爲把這個區域與整體聯系着的不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繫索，而是「亞洲式專制制度」的繫索。

由此看來，盧森堡甚至關於俄國政權底社會結構對資產階級波蘭的關係問題，也完全不能自圓其說，而關於俄國民族運動底具體歷史特點問題，更是提都沒有提起。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正應當來分析一下。

### (三)俄國民族問題底具體特點及 俄國資產階級民主的改革

…「雖然『民族自決權』原則是個極普泛的文句，不但適用於俄國境內各個民族，而且顯然是同樣適用於德國和奧國，瑞士和瑞典，美洲和澳洲境內各個民族，——雖然這個原則十分普泛，但我們無論在那一個現代社會黨底綱領內，都找不到這個原則」…（評論第六期，第四八三頁）。

盧森堡開始攻擊馬克思主義綱領第九條時，就是這樣寫的。她把誤將這一綱領條文看作「十分普泛的文句」的見解加在我們頭上，而她自己却恰巧是陷於這種錯誤，因為她竟大胆得可笑地宣稱，說這一條文「顯然是同樣適用於」俄德等等國家。

我們回答道：盧森堡顯然是打算在自己的文章中寫出一部可以用作中學教本的邏輯錯誤大全，因為她的議論完全是胡說八道，完全是譏笑歷史具體問題提法的。

如果不是用小孩子態度，而是用馬克思主義態度來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綱領，那就很容易猜到，這個綱領是關係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民族運動的。既然如此，——而且無

疑是如此——那末，這個綱領『顯然』是『籠統』關係於凡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民族運動的場合的一個『普泛文句』等等。而盧森堡只要稍加思索一下，也是顯然會得出認為我們的綱領僅僅關係於有這種運動存在的那些場合的結論。

盧森堡把這些顯然的理由思索一下，就會知道她所說的話是多麼糊塗了。他責備我們提出『普泛文句』時所用以反對我們的論據，是說在沒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民族運動的那些國家底綱領內沒有民族自決的條文！好一個聰明的論據呵！

拿各個國家底政治經濟發展情形來互相比較，以及拿各個國家內的馬克思主義綱領來互相比較，這從馬克思主義底觀點看來有莫大的意義，因為各個現代國家底資本主義本性以及它們的發展規律顯然是共同的。可是，這樣的比較，必須作得適當。這裏的起碼條件，就是要看清拿來互相比較的各個國家底歷史發展時期究竟是不是可以互相比較。譬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土地綱領，就只有愚蠢不過的人，才會把它拿去與西歐各個土地綱領『比較』（如杜魯別茨可義侯爵在俄國思想<sup>7</sup>上所作的那樣），因為我們的綱領所回答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的土地改革問題，而在西歐各國却已根本談不到這樣的改革了。

民族問題也是如此。民族問題在西歐大多數國家內早已解決了。在西歐各國綱領內去找對於不存在的問題的答覆，是很可笑的。這裏盧森堡恰恰忘掉了一件最主要的事

情：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改革早已完成的國家與尚未完成的國家之間的區別。

這一區別就是全部關鍵之所在。正因為盧森堡完全忽視了這一區別，所以她那篇洋洋大文也就成了一堆空洞無謂的普泛文句。

在西歐大陸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所包括的，是一段頗為確定的時期，大約從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一年止。這個時代恰恰是民族運動及建立民族國家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完結後，西歐便成了一些資產階級國家，而且通常是些單民族國家所構成的體系。因此，誰在現時到西歐社會黨人綱領內去找民族自決權，就是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底起碼原則。

在東歐與亞洲方面，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是在一九〇五年才開始的。俄國，波斯，土耳其以及中國的革命，巴爾幹半島的戰爭等，就是現今時代我們「東方」所發生的一串有世界意義的事變。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這一串事變是表示着許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民族運動，力求建立民族獨立和民族統一國家的運動興起的事實。正因為，而且只是因為俄國及其鄰邦處在這一個時代，所以我們需要在我們的綱領上提出民族自決權這一條。

我們且把上面從盧森堡論文中引證過的那段言論繼續摘引一下：

「…特別是——盧森堡寫道——在民族成份非常複雜的國家內工作，而認為民族問題有首要作用的那



個黨，即奧國社會民主黨底綱領內，並沒包含有民族自決權原則」（同上）。

總之，有人想拿「特別是」奧國的例證來說服讀者。我們且從具體歷史觀點上來看看這個例證是否有很多合理的東西吧。

第一，我們且提出關於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這個基本問題。奧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在一八四八年開始，而於一八六七年完結的。從那時到現在幾達五十年之久的過程中，那裏始終是由大體上已經奠定的資產階級憲制統治着，而合法的工人政黨也就是在這個憲制基地上公開活動的。

因此，在奧國內部發展條件中（即是從一般奧國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奧國各個民族中的資本主義發展方面看來），並沒有什麼產生突變的因素，而這種突變所能引起的現象之一，就是組織民族獨立國家。盧森堡拿俄國來與奧國比擬，以為俄國在這一點上是處在同樣的條件下，於是她就不但作了一個根本不對的反歷史的假定，而且是於無意中滾到取消主義方面去了。

第二，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在本問題上奧國境內各民族相互關係與俄國境內各民族相互關係完全不同。奧國不僅是在一個長時期內以德意志人佔過優勢的國家，而且奧國的德意志人還懷有過想做一般德意志民族霸主的野心。這種「野心」，——也許盧森堡（她似乎是很不喜歡普泛文句，死板，抽象東西的哩…）願意記起這件事實

吧，——是被一八六六年的戰爭所粉碎了。於是在奧國佔統治的民族——德意志人——竟落在一八七一年澈底組成的德意志人獨立國家以外了。另一方面，匈牙利人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的嘗試，早在一八四九年間就被俄國農奴制軍隊打破了。

於是就造成了一種非常特殊的局面：匈牙利人以及捷克人恰恰不是趨向於脫離奧國，而是趨向於保持奧國完整性，其目的正是爲了保持民族獨立地位，以免完全被那些更殘暴更強悍的隣國所破壞！奧國由於這種特殊情況，便形成爲兩個中心的（二元的）國家，而現在又變成爲三個中心的（三元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國家。

俄國是否有多少與此相像的情形呢？我們這裏的「異族人」是否有因恐受到更壞的民族壓迫而情願與大俄羅斯人合併的趨向呢？

只要提出這一問題，就可看出在民族自決問題上拿俄國來同奧國比較，是非常荒謬，非常死板，非常愚昧的了。

在民族問題上，俄國所具有的特殊條件恰恰是與奧國相反。俄國是以一個民族，即大俄羅斯民族爲中心組成的國家。大俄羅斯民族佔有巨大的集居地區，人口約有七千萬。這個民族國家底特點是：第一，「異族人」（統計起來，佔全國人口多數，即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邊陲區域；第二，這些異族人所受的壓迫比他們在各隣國（並

且不僅是在歐洲各國)所受的要厲害得多；第三，這些居住邊陲區域的被壓迫民族，往往有同族人民住在與俄國接壤的地方而享有較多的民族獨立權(例如住在俄國西南兩方邊界以外一帶的芬蘭人，瑞典人，波蘭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就是如此)；第四，資本主義底發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準，在「異族的」邊陲，往往高出於中心本部區域。最後，正是在鄰近的亞洲各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運動已經開始發展起來，而蔓延到住在俄國境內的那些同血統的民族。

由此可見，俄國民族問題底歷史具體特點，就使我們在現今時代承認民族自決權有特別迫切的意義。

況且，就是從純粹的事實方面來看，盧森堡所說奧國社會民主黨綱領上沒有承認民族自決權的斷語，也是不對的。只要打開通過了民族綱領的布隆代表大會底記錄一看，就可知道，當時有露新社會民主黨人甘克維赤，用全體烏克蘭(露新)代表團名義(記錄第八五頁)，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列格爾用全體波蘭代表團名義(記錄第一百〇八頁)提出聲明，說這兩個民族中的奧國社會民主黨人已把他們自己的民族力求民族統一，自由與獨立的趨向，列入自己的要求之內。可見，奧國社會民主黨雖然沒有在自己的綱領內直接提出民族自決權的要求，但它同時又完全容許黨內各部份提出民族獨立的要求。這在事實上當然也就是承認民族自決權！所以，盧森堡以奧國情形爲例的論據，在各方面都是反對盧森堡自己的。

#### (四)民族問題上的『求實主義』

機會主義者特別喜歡援引盧森堡底論據，說我們綱領第九條中沒有包含一點『實際的』東西。盧森堡自己也非常喜愛這個論據，她在她這篇文章中，常在一頁以內一連把這個『口號』重複八遍。

第九條，——她寫道，——『對於無產階級日常政策沒有給予任何實際的指示，對於民族問題沒有給出任何實際的解答』。

她這個論據又還表述如下：第九條不是毫無所指，便是責成大家贊助一切民族要求。我們且來把這個論據考查一下。

要求在民族問題上表現『求實精神』，這是什麼意思呢？

或是贊助一切民族要求；或是對每個民族分立問題作個『是或否』的具體回答；或是使民族要求一般可能直接『實現』。

我們就來把『求實』要求底這三種可能含義考查一下吧。

在一切民族運動開始時自然充當運動領導者的資產階級，把贊助一切民族要求稱爲求實的事情。但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也如在其他問題上一樣）的政策，却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贊助資產階級，而始終不與資產階級的政策相符合。工人階級只是爲謀得民族和平（民族和平是資產階級不能完全做到，而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時候才能實現的），爲謀得平等權利，爲求得最好的階級鬥爭環境，才贊助資產階級。所以無產階級恰恰是反對資產階級求實精神而提出民族問題上的原則政策，始終只是有條件地贊助資產階級。任何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都打算爲自己的民族謀得特權，或爲自己的民族謀得特殊利益；這也就叫做「求實精神」。無產階級反對任何特權，反對任何特殊利益。要無產階級表現「求實精神」，就等於遷就資產階級，陷入機會主義。

對每個民族分立問題都要作個「是或否」的回答麼？這似乎是個很「求實的」要求。其實它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形而上學的，而在實踐上則是使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政策。資產階級總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在第一位，把它們提作絕對的東西。而無產階級却認爲民族要求應服從於階級鬥爭利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該民族分立還是以該民族與別民族平等來結束，這在理論上是不能預先担保的；無產階級是需要在這兩種情形下都保證本階級底發展；資產階級是需要阻碍這種發展，把無產階級的任務推在「自己的」民族任務後面去。因此，無產階級就

以所謂否定式的要求，即以承認自決權爲限，而不向任何一個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個民族約許以侵害別民族利益爲代價的任何東西。

就算這是不合「求實精神」吧，但這在事實上是最能保障用儘可能民主辦法解決問題的；無產階級只是需要這種保障，而每一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則需要保障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底地位怎樣（不管它們受到何等損害）。

資產階級最注重該項要求底「實現」，——由此就有始終都以損害無產階級爲代價來與其他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妥協分贓的政策。而無產階級則需要鞏固自己的階級來反對資產階級，以澈底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來教育羣衆。

讓機會主義者去說這是不合「求實精神」吧，但這是唯一實在的保障，反對封建主和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而達到最高限度民族平等和民族和平的保障。

從每個民族中的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底觀點看來，無產者在民族問題上所提出的全部任務都是『不合求實精神』的，因爲無產者仇視任何民族主義，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消除任何特權。盧森堡沒有瞭解這一點，而糊糊塗塗讚美求實精神，這恰巧是爲機會主義者，特別是爲向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讓步的機會主義政策，大開方便之門。

爲什麼是向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讓步呢？因爲大俄羅斯

民族在俄國是個壓迫民族，而民族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在被壓迫民族中和壓迫民族中自然是表現得各不相同的。

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將以自己的要求「合乎求實精神」為藉口而號召無產階級無條件地擁護它的要求。最合求實精神的莫如直接說個「是」字，贊成某一個民族底分立，而不是贊成所有一切民族底分立權！

無產階級反對這樣一種求實精神。它承認各民族平等，承認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國家的平等權利時，把各民族無產者間的聯合看得高於一切，提得高於一切，而從工人底階級鬥爭方面着眼來估計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分立。求實精神底口號，其實不過是盲從資產階級趨向的口號。

有人對我們說：你們贊成民族分立權，就是贊成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樣說的有盧森堡，隨聲附和她的有機會主義者謝科夫斯基，——順便說說，他是在取消派報紙上對這個問題發表取消派思想的唯一代表人物！

我們回答道：不，在這裏，正是資產階級需要「合乎求實精神的」解決，而工人則認為必須在原則上劃清兩個趨向。當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對壓迫民族進行鬥爭時，我們始終都要比任何人更堅決地予以贊助，因為我們是最大胆，最堅決反對壓迫的。當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擁護自己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時，我們便要反對。我們

反對壓迫民族底特權和暴力行動，同時絲毫也不袒護被壓迫民族方面圖謀特權的趨向。

我們不提出，不鼓吹分立權的口號，就會不但是幫助了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而且是幫助了壓迫民族中的封建主和專制制度。考茨基早已提出這個論據來反對盧森堡，而且這個論據是無可爭論的。盧森堡因害怕「幫助」波蘭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而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綱領上規定民族分立權，事實上就是幫助着大俄羅斯民族中的黑幫派。她在事實上是幫助着容忍大俄羅斯人享受特權（並且是比特權更壞的東西）的機會主義政策。

盧森堡因醉心於反對波蘭民族主義而忘記了大俄羅斯人底民族主義，而這個民族主義正是現時最可怕的東西，正是少帶資產階級性而多帶封建性的東西，正是民主運動和無產階級鬥爭發展途程上的主要障礙物。每個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都含有反對壓迫的一般民主主義內容，而我們正是無條件地贊助這種內容，同時嚴格地把圖謀自己民族特殊地位的趨向區分出來，反對波蘭資產者壓迫猶太人的趨向等等。

這在資產者和市僧們看來是「不合求實精神」的。但這是民族問題上唯一合乎實際，真能幫助民主運動，促進自由，促進無產階級聯合的原則政策。

承認一切民族都有分立權；用排除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以及任何特殊地位的觀點來估計每一個關於分立的具體問題。



且拿壓迫民族底地位來講。壓迫他族人民的人民，能不能自由呢？不能。大俄羅斯居民\*爲要獲得自由，就須反對這種壓迫。鎮壓被壓迫民族運動的長期歷史，數百年來的歷史，「上層」階級一貫宣傳這種鎮壓的事實，造成了大俄羅斯人民的偏見而成爲阻碍大俄羅斯人民本身自由事業的莫大障礙。

大俄羅斯民族中的黑幫<sup>8</sup>黨人故意支持和助長這種偏見。大俄羅斯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容忍這種偏見或迎合這種偏見。大俄羅斯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一貫反對這種偏見，就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掃清走向自由的道路。

建立獨立自由的民族國家，在俄國暫時還祇是大俄羅斯民族底特權。我們大俄羅斯無產者既不擁護任何特權，當然也就不擁護這個特權。我們在這個國家範圍內奮鬥，把這個國家內所有一切民族的工人統一起來，我們不能担保某個民族按某條道路發展，我們要經過一切可能道路走向自己的階級目標。

可是，不反對一切民族主義，不堅決主張各族工人平等，便不能走向這一目標。例如，烏克蘭是不是一定會組

---

\*巴黎有一個名叫Л.Вл.的人，認爲這是個非馬克思主義的名詞。這個Л.Вл.是個怪人，superklug“（這個字在諷刺的意思上可譯爲「自作聰明的」）。這個「自作聰明的」Л.Вл.大概要寫一本東西，研究怎樣從我們的最低限度綱領中（根據階級鬥爭觀點！）剷除「居民」「人民」等字。

成爲獨立國家，這要依不能預先知道的千百種因素爲轉移。我們並不想來憑空「猜測」，而只是堅決主張毫無疑義的一點：烏克蘭有建立這樣一個國家的權利。我們尊重這種權利，我們不贊成大俄羅斯人統治烏克蘭人的特權，我們教育羣衆承認這種權利，否認任何一個民族底國家特權。

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所有一切國家都遭遇過的那種突變中，爲了建立民族國家的權利問題，可能而且大概一定會發生衝突和鬥爭。我們無產者預先就宣佈說我們反對大俄羅斯人的特權，並照着這個方向來進行全部宣傳鼓動工作。

盧森堡因追求「求實精神」而忽略了大俄羅斯無產階級及其他各族無產階級底主要實際任務，即進行日常宣傳鼓動，反對任何民族底國家特權，擁護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民族國家的同等權利的任務；這種任務是我們在民族問題上的主要（在現時的）任務，因爲祇有這樣，我們才能捍衛民主運動底利益以及各民族所有一切無產者平等聯合底利益。

讓大俄羅斯民族中的壓迫者和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都認爲這種宣傳「不合求實精神」吧（前者和後者都要求給一個「是或否」的肯定回答，而責備社會民主黨人態度「不確定」）。其實，正是這種宣傳，祇有這種宣傳，才能保證對羣衆進行真正民主主義，真正社會主義的教育。祇有這種宣傳，才能保障在俄國仍舊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

時，有最大的可能奠定俄國各民族間的和平，而在發生分立爲各個民族國家的問題時，又能最和平地（以及對於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沒有損害地）分立爲各個民族國家。

爲要更具體說明民族問題上這個唯一無產階級的政策，我們且把大俄羅斯自由派對於『民族自決』的態度以及挪威脫離瑞典分立的實例考察一下。

## (五)自由資產階級與社會黨機會主義份子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

我們已經說過，盧森堡當作一個主要「法寶」用來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綱領的論據，是說承認自決權便等於贊助被壓迫民族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她繼續說道，——如果把這種權利看成只是反對一切民族壓迫，那末在綱領上就不需要有特別的一條，因為社會民主黨是根本反對一切民族壓迫和不平等現象的。

正如考茨基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就已不容爭辯地指出過的那樣，第一個論據是把自己所犯的民族主義罪過加到別人身上，因為盧森堡自己因害怕被壓迫民族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而在事實上做了大俄羅斯人黑幫民族主義底幫手！第二個論據其實就是胆怯地迴避一個問題，即承認民族平權是不是包括承認分立權在內呢？如果包括在內，那就是說，盧森堡承認我黨綱領第九條在原則上正確。如果不包括在內，那就是說她不承認民族平權。在這裏迴避問題和支吾搪塞，是無濟於事的。

然而對於上述一類論據的最好檢驗，却是研究社會各階級對本問題的態度。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進行這種檢驗。

必須從客觀情形出發，必須考察各階級彼此對於這點的態度。盧森堡沒有這樣作，也就恰巧是犯了她枉然企圖歸罪於她的論敵們的那種形而上學，抽象，普泛文句，籠統等等的錯誤。

此地所說的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綱領，即俄國所有一切民族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底綱領。也許不妨考察俄國各統治階級底立場吧？

「官僚」（恕我們用用這個不確切的名詞）和貴族聯合會一類封建地主底立場，是人所共知的。他們無論對民族平等或自決權都持絕對否認態度。他們所喊的是從農奴制度時代拿來的舊口號，即專制主義，正教主義，民族主義，而且他們所謂民族只是指大俄羅斯民族而言。甚至烏克蘭人也被宣佈為「異族人」，甚至他們的民族語言也受壓制。

我們來看看那「被召來」參加政權，——固然所佔的地位很細微，但總算是參加政權，——參加「六三」立法行政制度<sup>9</sup>的俄羅斯資產階級。十月黨人<sup>10</sup>在這個問題上其實是跟隨右派走，這是用不着多說的。可惜，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大俄羅斯自由資產階級，進步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底立場是注意得太少了。然而，誰不研究這個立場，不考察這個立場，那他在討論民族自決權時就必然要陷入抽象和武斷的錯誤。

去年真理報<sup>11</sup>同言論報進行的論戰，使立憲民主黨底這個主要機關報，這個非常巧於玩弄外交狡猾手段而逃避

直接回答「麻煩」問題的機關報終於作了一些寶貴的承認。一九一三年夏天在里沃夫召集的全烏克蘭學生代表大會引起了一場大爭鬧。遐邇聞名的「烏克蘭問題專家」或言論報底烏克蘭記者莫吉梁斯基先生發表了一篇文章，用許多最厲害的罵人字眼（「夢囈」，「冒險主義」等等）攻擊烏克蘭分立思想，攻擊民族社會黨人董鑿夫所擁護而為該代表大會所贊同的這個思想。

工人真理報<sup>12</sup>，雖絲毫也不同意於董鑿夫先生，而乾脆地指出他是個民族主義社會黨人，說多數烏克蘭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贊成他的意見，但同時又聲明說，言論報底論調或言論報對於問題的原則提法，是大俄羅斯民主主義者或願意做一個民主主義者的人所完全不應有，完全不容許的。言論報儘可乾脆地反駁董鑿夫一流的先生，但一個以民主派自命的大俄羅斯機關報竟忘記分立自由和分立權利，却就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了。

過了幾個月之後，莫吉梁斯基先生在里沃夫城出版的烏克蘭文報紙道路上讀到了董鑿夫先生底駁覆意見——其中指出「言論報上沙文主義的攻擊，只是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刊物上受到了應有的指摘（是痛斥吧？）」，——便在言論報第三百三十一期上發表了一篇「解釋」文章。莫吉梁斯基先生底「解釋」，就是一連三次重複說：「批評董鑿夫先生所提出的辦法」，「是與否認民族自決權毫不相干的」。

「應當指出，——莫吉梁斯基先生當時寫道，——

『民族自決權』也不是什麼不容批評的偶像（聽呵！！）：民族生活底不良條件能引起民族自決問題上的不良傾向，而揭穿這種不良傾向並不就是否認民族自決權』。

可見，自由派份子關於『偶像』的論調，是恰與盧森堡底論調相合。很明顯的，莫吉梁斯基先生是想迴避直接回答問題：他究竟是承不承認政治上自決權，即分立權呢？

於是，無產階級真理報<sup>13</sup>（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的第四期）便向莫吉梁斯基先生和立憲民主黨劈面提出了這個問題。

當時言論報（第三百四十期）就發表了一篇沒有署名的，即編輯部的正式聲明，來回答這個問題，其內容可歸納為如下三點：

（一）在立憲民主黨綱領第十一條上，直接、確切而明顯地說到民族『自由文化自決權』。

（二）據言論報說，無產階級真理報把自決問題同分離主義，即某個民族分立的問題『混淆得一塌糊塗了』。

（三）『其實，立憲民主黨從來也沒有擁護過脫離俄國分立的『民族分立』權』（參看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無產階級真理報第十二期上所載民族自由主義和民族自決權一文）。

我們先來看看言論報聲明中的第二點。它十分顯然地對謝科夫斯基輩，李勃曼輩，尤爾克維奇輩及其他機會主義者先生們指明，他們大喊大叫，妄說『自決』一語意思

「不清楚」或「不確定」，其實，即按俄國各階級相互關係和階級鬥爭的客觀情形來說，不過是附和君主派自由資產階級底言論而已！

當時無產階級真理報向言論報中那些開明的「立憲民主主義者」先生們提出了三個問題：（一）他們是不是否認在全部國際民主運動史上，特別是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民族自決權始終都是恰巧瞭解成爲政治自決，即組織獨立民族國家之權呢？（二）他們是不是否認一八九六年的倫敦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底著名決議也是含有這種意思呢？（三）他們是不是否認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二年論及民族自決問題時，就把民族自決瞭解爲政治自決呢？——當無產階級真理報提出這三個問題時，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便啞口無言了！！

他們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因爲他們無言可答。他們不得不默然承認無產階級真理報絕對正確。

自由派大喊大叫，妄說「自決」概念不清楚，妄說社會民主黨把自決同分離主義「混淆得一塌糊塗」等等，不過是希圖混亂問題，不願承認民主派共同確定了的原則而已。謝科夫斯基，李勃曼和尤爾克維奇一流先生們若不是這樣愚昧無知，就會羞於用自由派口吻來向工人說話了。

讓我們繼續說下去吧。無產階級真理報竟使言論報不得不承認說，立憲民主黨綱領上所講的「文化」自決，就是否認政治自決。



「其實，立憲民主黨從來也沒有擁護過脫離俄國分立的『民族分立』權』，——無產階級真理報把言論報所說的這些話當作我國立憲民主黨人『忠順』底模範，介紹給新時代報和地方自治局日報<sup>14</sup>看，並不是枉然的。新時代報在第一三五六三期上，當然沒有放過機會來罵罵『猶太鬼子』，並向立憲民主黨人說出各種刺耳的話，但同時又聲言說：

『社會民主黨人所認定為政治哲理定律的東西』（即承認民族自決權，分立權），『現時甚至在立憲民主黨人中間也開始激起意見分歧了』。

立憲民主黨人聲明他們『從來也沒有擁護過脫離俄國分立的民族分立權』，於是就在原則上站到與新時代報完全一樣的立場上去了。這也就是立憲民主黨人所持民族主義自由派立場底基本原則之一，他們與普里什克維奇<sup>15</sup>輩接近，他們在政治思想上和政治實踐上依附於普里什克維奇輩的基本原則之一。『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學過歷史，——無產階級真理報寫道，——分明知道，普里什克維奇輩『只捉不放』<sup>16</sup>的永古權利的實行，在實踐中往往引起了怎樣——柔和些說——『蹂躪式的』行動』。立憲民主黨人分明知道普里什克維奇輩無上權力底封建根源和性質，但他們還是完全站到擁護這個階級所造成的關係和國界的立場上去。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分明知道這個階級所造成的或決定的關係和國界中有極多的非歐洲式的，反歐洲式的（如果聽起來不好像是誣蔑了日本人和中國人的話，那

我們就要說是亞洲式的)東西，但他們還是認為這些關係和國界絕對不可踰越。

這也就是適應普里什克維奇輩，委曲地逢迎他們，惟恐搖動他們的地位，保衛他們不受人民運動攻擊，不受民主運動攻擊。「其實，——無產階級真理報寫道，——這是適應於農奴主利益，適應於統治民族最壞的民族主義偏見，而不願一貫進行反對這種偏見的鬥爭」。

立憲民主黨人熟悉歷史，且以民主主義者自命，所以他們甚至不敢企圖斷言，說現在成爲東歐和亞洲一般特徵的民主運動，力求按各文明資本主義國家模樣改造東歐和亞洲的民主運動，一定要絕對保存封建時代，普里什克維奇輩權力無上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大眾沒有權利的時代所決定的國界。

無產階級真理報同言論報爭論時所提出的問題，並不是什麼文字上的爭論問題，而是關係於當前真正政治迫切問題的問題，這是也由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召集的最近那次立憲民主黨代表會議證明了的。在言論報（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的第八十三期）敘述這次代表會議工作經過的正式報告中說道：

「民族問題也討論得特別熱烈。基也輔的代表（涅克拉索夫和高留巴金兩人也贊同他們的意見）指出，民族問題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必須比以前更堅決地贊助這個因素。可是」（這個「可是」恰與謝德林所說的那個「但是」——即所謂「耳朵不會生

在額角以上去」一語——相合)「科可什金認為無論綱領或過去的政治經驗，都要求我們很小心地對待「民族政治自決」這一「普泛條文」」。

立憲民主黨代表會議上這個極美妙的議論，極值得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和一切民主主義者注意。(附帶指出，顯然熟知內幕並無疑是正確傳達科可什金先生意思的基也輔思想報<sup>17</sup>補充着說，科可什金特別指出過國家「瓦解」的危險，當然是爲警告論敵而指出這點的)。

言論報發表的正式報告是用絕頂圓滑的外交筆墨寫成，爲的是盡可能少打開些幕布，多隱藏些內情。但從這個報告中，大體上總可看出立憲民主黨代表會議上的經過情形。熟悉烏克蘭情形的自由資產者代表和「左派」立憲民主黨人所提出的，正是民族政治自決問題。不然，科可什金先生就無須號召「小心對待」這一「條文」了。

在立憲民主黨人綱領——立憲民主黨代表會議上的代表們當然知道這個綱領——上所載的，恰巧不是政治自決，而是「文化」自決。可見，科可什金先生是捍衛綱領而反對烏克蘭代表和左派立憲民主黨人底攻擊，是捍衛「文化」自決而反對「政治」自決。科可什金先生表示反對「政治」自決，指出「國家瓦解」的危險，把「政治自決」條文稱爲「普泛的」(恰與盧森堡底論調相合!)，當然就是捍衛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自由派，而反對立憲民主黨內較爲「左傾的」或較爲民主的份子，反對烏克蘭資產階級。

科可什金先生在立憲民主黨代表會議上獲得勝利了，這從言論報底報告上露出狐狸尾巴來了的「可是」一字中就可看出。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自由派在立憲民主黨人中獲得勝利了。難道這種勝利還不能促使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步武立憲民主黨人後塵，而害怕「普泛的民族政治自決條文」的那些糊塗蟲醒悟過來麼？

「可是」我們現在來切實看看科可什金先生底思維歷程吧。科可什金先生援引「過去的政治經驗」（顯然是指一九〇五年底經驗而言，當時大俄羅斯資產階級恐怕喪失掉自己的民族特權，並以它自己的恐懼心理來恐嚇了立憲民主黨）而指出「國家瓦解」危險時，就表明他很知道政治自決權除了實行分立而組織獨立民族國家以外，便不能有什麼別的意思。試問從一般民主運動方面，特別是從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方面來說，究應怎樣來觀察科可什金先生底這種憂慮呢？

科可什金先生硬說承認分立權就會增加「國家瓦解」的危險。這是確遵「只捉不放」這一格言的巡警美穆列曹夫<sup>18</sup>底觀點。而從一般民主運動底觀點來看，却恰巧相反：承認分立權就會減少「國家瓦解」的危險。

科可什金先生底議論完全與民族主義者底精神相合。民族主義者在其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猛烈攻擊了烏克蘭的馬齊伯派<sup>19</sup>。烏克蘭的運動，——薩文科先生和他的伙伴們叫道，——有使烏克蘭與俄國聯繫減弱的危險，因為奧國正利用親烏政策來鞏固烏克蘭人與奧國的聯繫！！令人

莫解的，就是爲什麼俄國不可用薩文科一流先生們所歸罪於奧國的那種方法，即給予烏克蘭人利用本民族語言，自治和自治議會等等自由的方法，去試圖「鞏固」烏克蘭人與俄國的聯繫呢？

薩文科一流先生們底議論是和科可什金一流先生們底議論完全相同，而且從純粹的邏輯方面來看，又是一樣可笑，一樣荒謬的。烏克蘭民族在某一國家內享有的自由愈多，烏克蘭民族與這一國家間的聯繫也就會愈加堅固，這難道不是很明顯麼？我想，不堅決拋棄民主主義底一切原理，是決不能否認這個初步真理的。試問能不能有什麼比分立自由，即組織獨立民族國家的自由更大的真正民族自由呢？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更進一步解釋被自由派（和那些因爲頭腦簡單而附和他們的人）弄糊塗了的這個問題。就拿離婚問題來說吧。盧森堡在她的論文中寫道，中央集權制的民主國家雖完全可與個別部份自治相容，但它應當把一切最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關於離婚問題的立法工作，留歸中央國會處理。這樣關心用民主國家底中央政權來保障離婚自由，是完全正當的。反動份子反對離婚自由，號召大家「小心對待」它，而且大聲叫喊，說離婚自由就是「家庭瓦解」。而民主派則認爲，反動份子是有意作僞，其實是擁護着警察官僚專橫，擁護男性享受特權而女性遭受最難堪壓迫的情形；其實離婚自由並不會使家庭關係瓦解，而恰巧會使這種關係在文明社會中唯一可能的堅固民主主義原則基礎上鞏固起來。

罵擁護自決自由，即分立自由的人爲鼓勵分離主義者，也如罵擁護離婚自由的人爲鼓勵破壞家庭關係者一樣愚蠢，一樣虛偽。在資產階級社會裏，只有擁護資產階級婚姻所賴以支持的特權和買賣性的人，才會反對離婚自由，同樣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否認民族自決，即民族分立自由，就不過是擁護統治民族特權和警察管理手段，反對民主制度。

毫無疑義，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各種關係所產生的政客習氣，有時也使國會議員或政論家極端輕率地，甚至簡直荒謬可笑地空談某個民族底分立問題。可是，只有反動份子才甘受這種空談恐嚇（或假裝成受這種空談嚇倒的樣子）。凡是站在民主制觀點上，即主張由民衆解決國家問題的人，都明白知道，政客底荒唐空談與民衆解決問題是『相隔天壤』的。民衆根據日常經驗，很知道地理上和經濟上聯繫底意義，巨大市場和巨大國家底優點，所以他們只有當民族壓迫和民族衝突使其絕對不堪共同生活並阻碍所有一切經濟關係時，才會贊同分立。而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發展和階級鬥爭自由底利益是會要恰巧擁護分立的。

總之，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觀察科可什金先生底議論，都可看出這種議論絕頂荒謬，嘲弄民主原則的性質。但這種議論也含有某種邏輯，即大俄羅斯資產階級階級利益底邏輯。科可什金先生，也如立憲民主黨底大多數人一樣，是這個資產階級錢庫底看門狗。他擁護資產階級底一般特權，特別是它的國家特權；他同普里什克維奇肩靠肩地擁

護這些特權，不過普里什克維奇多相信農奴制的棍子，而科可什金輩則知道這根棍子已被一九〇五年事變折破得很厲害了，所以多指望於資產階級愚弄羣衆的手段，例如用『國家瓦解』的臆造危險來威嚇市僧和農民，用什麼『人民自由』與歷史基礎相結合的辭句來欺騙他們等等。

自由派反對民族政治自決原則的態度，其唯一實際階級意義，就是民族主義自由派的思想，就是要捍衛大俄羅斯資產階級底國家特權。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的機會主義者，這些恰巧在現今六三制度時代極力反對民族自決權的人，即取消派份子謝科夫斯基，崩得份子李勃曼，烏克蘭小資產者尤爾克維奇等，其實不過是跟着民族主義自由派底尾巴跑，而用民族主義自由派的思想來腐化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及其反資本主義鬥爭底利益，是要所有各個民族中的工人完全團結和最密切統一起來，是要反對任何一個民族中的資產階級所實行的民族主義政策。所以，社會民主黨如果否認自決權，即被壓迫民族底分立權，或贊助被壓迫民族資產階級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就會同樣是離開無產階級政策底任務，而使工人服從於資產階級政策。在僱傭工人看來，不管誰是他的優先剝削者，不管是大俄羅斯資產階級比異族資產階級佔優先地位也好，或波蘭資產階級比猶太資產階級佔優先地位也好，都是一回事情。在覺悟了自己階級利益的僱傭工人看來，無論是大俄羅斯資本家底國家特權也好，無論是波蘭資本家或烏克

蘭資本家約許說他們一擁有國家特權時，人間就會天堂出現也好，都是不足介意的。無論是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或是在分立的單民族國家中，不管怎樣，資本主義底發展總是在前進着，並且會繼續前進。

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下，僱傭工人總是會遭受剝削，所以無產階級爲了順利進行反對剝削的鬥爭，就要不依賴民族主義而獨立，就要在各民族資產階級爭霸的鬥爭中保持所謂完全中立。任何一個民族中的無產階級稍微擁護「自己」民族資產階級底特權，都必然會引起另一民族中無產階級對它表示不信任，都會削弱工人底國際階級團結，都會分散工人而使資產階級稱快。否認自決權或分立權，實際上就必然是擁護統治民族底特權。

我們拿挪威脫離瑞典分立的具體例證來看，就能更明白認識這一點。



## (六)挪威脫離瑞典而分立

盧森堡正是援引這個例證，並根據這個例證推論說：

『聯邦關係史上最近一次事變，即挪威脫離瑞典分立這一事變發生時，波蘭社會愛國派刊物（見克拉科夫城的前進報<sup>20</sup>）馬上就把它抓住，作為是表明國家分立趨向含有強大力量和進步作用的一種可喜現象，但這次事變立刻就變成了表明聯邦主義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國家分立運動決不是一種進步運動或民主運動的鐵證。在挪威發生了這次撤銷驅走瑞典國王的所謂『革命』之後，挪威人就安然用人民投票辦法正式推翻了成立共和國的計劃，而給自己選出了另一個國王。那些崇拜任何民族運動和任何一種獨立趨向的皮相之徒所宣稱為『革命』的事件，原來不過是表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懷有部落主義，想用自己的金錢找一個『自家的』國王，以代替瑞典貴族所強加於他們的國王，因而也就是一種與革命毫不相干的運動。同時，這次瑞挪聯合王國破裂的事實又證明了，迄今存在的聯邦制，就在這裏也不過是純粹王朝利益底表

現，因而也就是君主政體和反動底一種形式……」（評論雜誌）。

這就是盧森堡論到本問題時所說的一切！！必須承認，盧森堡解釋這個例子時是把自己的脆弱立場暴露得最明顯不過了。

以前和現在所說的，都是民族複雜的國家內社會民主黨應否有承認自決權或分立權綱領的問題。

關於這一問題，盧森堡自己所舉出的挪威實例，究竟向我們說明了什麼呢？

我們的作者轉彎抹角，繞來繞去，玩弄聰明，高聲大喊來反對前進報，但不回答問題！！盧森堡說得天花亂墜，但對於問題實質却不置一辭！！

毫無疑義，挪威的小資產者想用自己的金錢找一個本族的國王，並由人民投票否決成立共和國的計劃，是暴露了最壞的市儈根性。毫無疑義，前進報如果沒有看到這一點，那它就是暴露了同樣壞的，並且是同樣市儈的根性。

但所有這些究竟與問題有何相干呢？

所說的問題，是民族自決權以及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對此權利的態度呵！爲什麼盧森堡不回答問題，而只是兜着圈子呢？

常言道，貓兒是老鼠心目中再兇不過的獸物。大概，盧森堡是認爲沒有比「弗拉克派」更兇的獸物。「弗拉克派」是波蘭社會黨的俗稱，即所謂革命派別組織，而克拉

科夫城的可憐的前進報是贊同這個「派別組織」底思想的。盧森堡因為努力同這個「派別組織」底民族主義立場作鬥爭，竟弄得眼花目眩，以致除了前進報之外，就連什麼都看不見了。

如果前進報說「是」，那末盧森堡就認為她的神聖天職是要馬上說個「不是」，殊不知她運用這種手段，並不是表明她對前進報的不依賴性，反而是表明她對「弗拉克派」依賴到可笑的地步，表明她不善於用一種比克拉科夫地方鼠目寸光的人稍微深刻，稍微寬廣的觀點去觀察問題。前進報當然是個很不好的，而且根本不是個馬克思主義的機關報，但我們既然舉出了挪威的實例，就應當來分析這個實例底實質。

我們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這個實例時，並不是要說明那些極可怕的「弗拉克派」底劣根性，而首先是要說明挪威脫離瑞典分立這一事件底具體歷史特點，其次是要說明兩國無產階級在發生這個分立時的任務。

使挪威與瑞典接近的那些地理、經濟及語言上的聯繫，其密切程度並不亞於許多非大俄羅斯的斯拉夫民族與大俄羅斯民族的聯繫。但挪威與瑞典結合不是自願的，所以盧森堡說到「聯邦制」實在是毫無理由，而不過是因為她不知道要說什麼罷了。挪威是在拿破崙戰爭時代由各國皇帝違背挪威人底志願送給瑞典的，而且瑞典人只是把軍隊調到挪威以後，才把挪威征服。

此後在幾十年長的時間內，雖然挪威享有非常廣泛的

自治權（有自己的議會等等），但挪威和瑞典經常發生磨擦，挪威人極力設法擺脫瑞典貴族底束縛。一九〇五年八月，他們終於擺脫了這種束縛：挪威議會通過決議，表示再不承認瑞典國王爲挪威國王，後來舉行的挪威人民全體投票，全民公決，又以絕大多數的票數（約二十萬票與幾百票之比）贊成完全脫離瑞典而分立。瑞典人經過一些動搖之後，只得容忍了分立的事實。

這個實例向我們指明，在現代經濟和政治的關係下，究竟是根據何種原因而可能發生民族分立並實現這種分立，以及在有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情形下，這種分立常是經過何種形式來實現。

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他不敢說政治自由和民主問題對他不關痛癢（否則他自然就會不成其爲社會民主黨人了），就不能否認，這個實例在實際上證明覺悟的工人必須一貫進行宣傳和準備工作，使那些因民族分立問題而可能發生的衝突，只是按照一九〇五年挪威與瑞典兩國衝突的解決法那樣去解決，而不是『按俄國方式』去解決。這也就是承認民族自決權的綱領要求所表示的意思。所以盧森堡也就只好用嚴厲攻擊挪威市僧們底市僧行爲和克拉科夫城的前進報的方法來推開這個不利於她的理論的事實，因爲她明白知道，這個歷史事實把她妄說民族自決權是一種『空想』，是等於『用金碗吃飯』的權利等等詞句，完全駁倒到無可救藥的地步。這種詞句不過是表示着滿心相信東歐各民族間現有力量

對比永不可變的那種貧乏而自滿自足的機會主義思想而已。

我們再往下看吧。在民族自決問題上，也如同在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樣，我們應當首先注意和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各民族內部的無產階級自決。盧森堡把這個問題也輕易地放過去了，因為她覺得，按她所舉的挪威實例來分析這個問題，是於她的理論不利的。

在因分立而起的衝突中，挪威無產階級和瑞典無產階級究竟採取了何種立場，以及究竟應當採取何種立場呢？在分立之後，挪威覺悟工人自應投票贊成共和制\*，而如果有投別種票的社會黨人，那就只是證明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間還有許多往往是冥頑市儈性的機會主義成分罷了。關於這一點是不能有兩種意見的，而我們之所以提到這一點，只是因為盧森堡想用文不對題的空話來抹煞問題實質。我們不知道，在分立問題上，挪威社會主義的綱領是否責成挪威社會民主黨人持着一個確定的意見。我們就假定他們的綱領並沒有責成這樣作，假定挪威社會黨人是把挪威自治能否充分保證階級鬥爭自由，以及挪威人同瑞典貴族經常發生的磨擦衝突如何妨害經濟生活自由的問題當作懸案吧。但挪威無產階級應當反對這個貴族而擁護挪威

\*如果當時挪威民族中的大多數擁護君主制，而無產階級擁護共和制，那末，一般說來，在挪威無產階級面前就擺着有兩條道路：或是——如果革命條件已經成熟的話——實行革命，或是服從大多數而去進行長期的宣傳鼓動工作。

農民民主運動（不管這個運動有怎樣市儈性的狹隘成分），却是無可爭辯的。

而瑞典無產階級呢？大家知道，瑞典牧師所協助的瑞典地主們曾鼓吹用戰爭反對挪威，同時又因為挪威比較瑞典弱得多，因為它已遭受過瑞典的侵犯，因為瑞典貴族在本國內佔有很大勢力，於是這種鼓吹就成為很嚴重的威脅。可以担保說，瑞典的科可什金輩是長期和竭力用號召大家「小心對待」「民族政治自決這一普泛條文」，拚命描繪「國家瓦解」危險，硬說「人民自由」可與瑞典貴族制度基礎相容等語來蠱惑過瑞典民衆的。毫無疑義，如果瑞典社會民主黨沒有竭力奮鬥，既反對地主思想和政策，又反對「科可什金主義的」思想和政策；如果它除了一般民族平等（科可什金輩也承認的平等）之外，沒有堅持過民族自決權，即挪威分立自由，那它就算是背叛了社會主義事業和民主事業了。

瑞典工人這樣承認挪威人民分立權，結果是促進了挪瑞兩國工人底密切聯合，促進了他們極親密的階級團結。因為挪威工人由此就知道瑞典工人沒有沾染瑞典民族主義，瑞典工人是把他們同挪威無產者親密聯合看得比保全瑞典資產階級和貴族底特權重要些。歐洲各國君主和瑞典貴族所加強於挪威的這種聯繫的破壞，使挪威工人與瑞典工人中間的聯繫加強了。瑞典工人證明他們不管資產階級政策底一切變遷（在資產階級關係底基礎上，用強力迫使挪威人服從瑞典人的事情，是完全可能重復發生的！），

而始終能保持捍衛兩族工人完全平等和階級團結，來同時反對瑞典資產階級和挪威資產階級。

由此可見，「弗拉克派」有時企圖「利用」我們與盧森堡的意見分歧去反對波蘭社會民主黨，是毫無根據，而且簡直是不鄭重的。「弗拉克派」並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是社會主義的政黨，而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政黨，可以說是波蘭的社會革命黨。從來也沒有談到，而且根本也就談不到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與該黨的任何統一。反之，任何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從來也沒有『懊悔過』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接近和聯合的事情。波蘭社會民主黨有重大的歷史功勳，它第一次在澈頭澈尾浸透了民族主義趨向和狂熱的波蘭建立了真正馬克思主義，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但波蘭社會民主黨這一功勳之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為盧森堡說了一些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綱領第九條的荒唐話，而是不管有這件可悲的事實。

「自決權」對於波蘭社會民主黨，自然沒有如像對俄國社會民主黨那樣重大的意義。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因反對醉心民族主義的波蘭小資產階級而特別（有時候也許是稍微過分）努力「矯枉過正」，本是情有可原的。從來也沒有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想把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波蘭分立的主張當作他們的罪過。這些社會民主黨人只有當他們如盧森堡那樣試圖否認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綱領上必須承認自決權的時候，才算是犯了錯誤的。

其實，這就是把那種從克拉科夫地方狹隘觀點看來情

有可原的態度，搬到俄國所有一切民族——包括大俄羅斯人在內——範圍中來。這就是做「變相的波蘭民族主義者」，而不是做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做國際社會民主黨人。

因為國際社會民主黨人正是主張承認民族自決權的。現在我們就要來說這一點。



## (七)一八九六年倫敦國際代表大會底決議

這個決議上寫道：

『代表大會特此宣佈，它主張一切民族有完全自決權(Selbstbestimmungsrecht)，並對現時所有受軍事、民族或其他專制制度壓迫的國家中的工人表示同情；大會號召所有這些國家中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覺悟的（即覺悟到本階級利益的）工人底隊伍，來共同奮鬥，以求戰勝國際資本主義而實現國際社會民主運動底目的』\*。

我們已經說過，我國的機會主義者，謝科夫斯基，李勃曼，尤爾克維奇諸先生，簡直不知道有這個決議存在。但盧森堡知道這個決議，並且引了它的全文，其中也與我們的綱領一樣，載有「自決」一語。

---

\*參看用德文正式公佈的倫敦代表大會工作報告：各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職工會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一日在倫敦舉行的國際代表大會記錄與決議，一八九七年柏林出版，第一八頁。歷屆國際代表大會決議已印成俄文小冊子出版，那裏把「自決」一語誤譯成爲「自治」了。

試問，盧森堡是怎樣來剷除橫在她的「新奇」理論路上的這個障礙的呢？

呵，簡單得很：…這裏的重心，是在決議案第二部份…這個決議帶有宣言的性質…祇是出於誤會才可援引它!!

我們的這位作者一籌莫展和狼狽周章，簡直令人吃驚。只有機會主義者，通常都把一貫的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政綱條文指為是宣言性質，而又怯懦地躲避反對這些條文的直接爭論。顯然，這次盧森堡陷入謝科夫斯基、李勃曼、尤爾克維奇一流先生們的可憐伙伴中去，並不是偶然的。盧森堡不敢公開聲明，她到底認為她所引來的決議案是正確的呢，還是錯誤的呢。她支吾着，躲閃着，好像指望讀者都是些很不細心，很不懂事，讀到決議案後半節便忘掉前半節的人，或者是從來沒有聽見過倫敦代表大會以前在社會主義刊物上進行的那些爭論的人。

但盧森堡如果以為她在俄國覺悟工人面前能如此容易把國際關於重要原則問題的決議，甚至不願用批評態度去把它分析一下，就隨便加以踐踏，那她就未免大錯而特錯了。

盧森堡底觀點，在倫敦代表大會以前的爭論中——主要是在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底新時代雜誌上——就發表過，而這個觀點其實是在國際面前遭了失敗的！這就是俄國讀者所應當特別注意的問題實質。

當時所爭論的是波蘭獨立問題。所發表的觀點一共有三種：

(一)『弗拉克派』底觀點，代表他們講話的是赫克爾。他們要國際在自己的綱領中承認波蘭獨立的要求。這個提議沒有通過。這個觀點在國際面前遭了失敗。

(二) 盧森堡底觀點：波蘭社會主義者不應當要求波蘭獨立。這個觀點是根本不容許宣佈民族自決權的。這個觀點也在國際面前遭了失敗。

(三) 考茨基當時發揮得最圓滿的觀點；考茨基反對盧森堡，而證明說她那種唯物主義思想是極端『片面性的』。照這個觀點看來，國際現時不能把波蘭獨立作為自己的綱領，但波蘭社會主義者，——考茨基說，——完全可以提出這類的要求。從社會主義者底觀點看來，在有民族壓迫的情形下忽視民族解放的任務，是絕對錯誤的。

在國際底決議中也就採納了最後這個觀點底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則：一方面，完全肯定而不容絲毫曲解地承認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決權；另一方面，又同樣毫不含糊地號召工人建立他們階級鬥爭底國際統一。

我們認為這個決議完全正確，而且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東歐和亞洲各國，只有根據這個決議，只有把它這兩部份密切聯貫起來，才可規定出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的階級政策。

現在我們就要詳細分析上述三種觀點。

大家知道，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積極贊助波蘭獨立的

要求，是西歐一切民主派，尤其是社會民主派所絕對應該的。對於前世紀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即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俄國『農民改良』時代說來，這個觀點是個完全正確，而且是唯一澈底民主主義的和無產階級的觀點。當俄國和大多數斯拉夫國家中的民衆還在沈眠不醒的時候，當這些國家還沒有什麼獨立羣衆民主運動的時候，波蘭貴族的解放運動，不但從全俄，全斯拉夫的民主運動觀點看來，就是從全歐民主運動觀點看來，都有頭等巨大的意義\*。

馬克思底這種觀點，對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說來完全正確，但到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却已不復正確了。在大多數斯拉夫民族的國家，甚至其中最落後國家之一的俄國，都掀起了獨立的民主運動，甚至獨立的無產階級運動。貴族的波蘭已經消逝而讓位給資本主義的波蘭了。在這樣的情形下，波蘭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義。

---

\* 如果把一八六三年波蘭起義貴族底主張，全俄民主革命家契爾內舍夫斯基底主張以及烏克蘭市僧德拉果曼諾夫在多年以後所提出的主張，拿來作一比較，倒是一件極有趣味的歷史研究工作：契爾內舍夫斯基也能夠(如馬克思一樣)重視波蘭運動底意義，而德拉果曼諾夫則代表着還是極端粗野昏沉，只看見自己一堆糞草的那種農民意見，這種農民竟因正當仇恨波蘭貴族而不能瞭解這些貴族底鬥爭對於全俄民主運動底意義。(請看德拉果曼諾夫所著歷史上的波蘭與全俄的民主派一文)。德拉果曼諾夫後來備受當時已變成民族自由派的司徒盧威先生稱讚，是理所應當的。

「波蘭社會黨」（現時的「弗拉克派」）在一八九六年企圖把另一時代的馬克思觀點「鞏固起來」，就已經是利用馬克思主義底字句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底精神了。因此，當時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實行反對波蘭小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狂熱，指明民族問題對於波蘭工人祇有次要意義，第一次在波蘭創立起純粹無產階級政黨，並宣佈俄羅斯工人與波蘭工人在其階級鬥爭方面實行極緊密聯盟的極重要原則，都是作得完全正確的。

但這是不是說，國際在二十世紀初，可以認為民族政治自決原則對於東歐和亞洲是不需要的呢？可以認為民族分立權是不需要的呢？如果認為這樣，那就是荒謬絕倫，就等於（在理論上）承認土耳其、俄國及中國國家制度底資產階級民主改革已經完結，就等於（在實際上）對專制政體採取機會主義態度。

不。對於東歐和亞洲說來，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開始的時代，民族運動激發加劇的時代，在獨立無產階級政黨產生的時代，這些政黨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務應當是兩方面的：一方面要承認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因為資產階級民主改革還沒有完成，因為工人民主派不是用自由派態度，不是用科可什金派的態度，而是澈底、認真、誠懇地主張民族平等；另一方面，要主張該國所有各民族中的無產者建立十分緊密而不分離的階級鬥爭聯盟，而不管該國歷史怎樣變遷，不管資產階級怎樣變更各個國家底界綫。

一八九六年的國際決議案所規定的，正是無產階級所

負有的這兩方面的任務。一九一三年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夏季會議所通過的那個決議底原則基礎，正是這樣。有些人覺得這個決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為他們認為決議案在第四條上承認民主自決權，民族分立權，就算是『給了』民族主義最高限度的讓步（其實，承認一切民族有自決權，却是最高限度的民主主義和最低限度的民族主義），而在第五條上，却又預告工人要反對任何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口號，要各民族中的工人都統一溶合為國際統一的無產階級組織。可是，只有頭腦簡單到極點的人，才會認為這裏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為他們不能瞭解，為什麼——舉例來說——瑞典工人保持了挪威實行分立而組織獨立國家的自由，結果就是促進了瑞挪兩國無產階級底統一和階級團結。

## (八) 空想的馬克思與求實的盧森堡

盧森堡說波蘭獨立是一種「空想」，並且再三再四地把這句話重複得令人發嘔，而用譏諷的態度感歎道：爲什麼不提出愛爾蘭獨立的要求來呢？

「求實的」盧森堡，顯然不知道馬克思對於愛爾蘭獨立問題採取了怎樣的態度。這一點值得講一講，以便說明應怎樣用真正馬克思主義觀點，而不是用機會主義觀點來分析具體的民族獨立要求。

馬克思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慣於用「摸牙齒」的辦法來檢查他所認識的社會主義者們底覺悟性與篤信心。馬克思認識羅巴庭以後，便於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五日寫信給恩格斯，極力稱讚這位俄國少年社會主義者，但同時補充說：

「…弱點就是波蘭問題。羅巴庭對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完全同英國人——例如英國舊派憲章運動家——對於愛爾蘭所說的話一樣」。

馬克思向壓迫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質問他對被壓迫民族的態度怎樣，就立刻發現統治民族（英吉利與俄羅斯）

中的社會主義者底一個共同缺點：不瞭解他們對被壓迫民族所負的社會主義義務，而一味重覆他們從『大國』資產階級方面接受來的偏見。

在沒有講到馬克思對於愛爾蘭問題的積極主張以前，我們就必須附帶聲明一下，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一般民族問題總是採取嚴格批評的態度，而認為這個問題只有相對的歷史意義。例如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說，由於研究歷史的結果，使他對於波蘭問題得出悲觀的結論，認為波蘭問題只有暫時的義意，只是在俄國土地革命以前才有意義。說波蘭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種『大胆的荒唐舉動』。『波蘭甚至單對俄國來說，也絕對不能表現什麼進步或歷史意義』。俄國所有的文化、教育、工業以及資產階級成份，要比『沉眠不醒的貴族波蘭』多些。『華沙與克拉科夫怎能比得上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薩呢！』恩格斯不相信波蘭貴族底起義能有什麼成功。

可是這些具有極多英明遠見的思想，絕對沒有妨碍恩格斯和馬克思過十二年以後，即當俄國仍在沉眠，而波蘭却已經沸騰起來的時候，又對波蘭運動表示極深切熱烈的同情。

一八六四年，馬克思起草國際宣言時寫信給恩格斯（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說必須同馬志尼底民族主義思想作鬥爭。他說：『當宣言內說到國際的政策時，我講的是國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國，而不是比較次



要的國家」。民族問題與「工人問題」比較起來，只有一種從屬意義，這在馬克思看來是無可置疑的。但他的理論與忽視民族運動的觀點絕對不同。

一八六六年到來了。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論到巴黎「蒲魯東派」，說他們「宣佈民族性為無稽之談，而攻擊俾斯麥與加里波的兩人。把這一策略當作反對沙文主義的論戰手段來用，是很有益處，而且可以解釋的。可是信仰蒲魯東的人（我這裏的好友拉法格和龍格，也在其內）竟認為全部歐洲都可以而且應當安分守己，坐在那裏等待法國老爺們來消滅貧窮與愚昧…這難道不是可笑之至麼」（一八六六年六月七日的信）。

「昨天，——馬克思在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寫道，——在國際總委員會裏討論過目前戰爭問題…果然不出所料，討論歸結到了「民族性」問題與我們對該問題的態度…「少年法國」底代表（非工人）發表意見，說一切民族性以及民族本身都是陳腐的偏見。這是蒲魯東主義的斯底納思想<sup>21</sup>…全世界都應當等候法國人成熟起來實行社會革命…我開始發言時就說，我們的朋友拉法格及其他廢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們講法語，即是講會場上十分之九的人都不懂得的語言。英國人聽到我這一段話，就哈哈大笑起來。後來我又暗示說，拉法格自己竟不覺得，他所謂否認各個民族特性，大概就是認為要由模範式的法國民族來吞併各個民族哩」。

從馬克思所有這些批評意見中，便可得出一個很明顯的結論：工人階級是最不會把民族問題當作偶像的，因為資本主義底發展不一定就喚起一切民族都來爭取獨立生活。可是，既然羣衆的民族運動已經產生出來了，那末不理會它，不去贊助其中所有的進步成份，這在事實上就是陷入民族主義的偏見，就是認為「自己的」民族是「模範民族」（或者——我們補充一句——是唯一享有建立國家的特權的民族）\*。

我們又來講愛爾蘭問題吧。

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主張，在他的書信裏有如下幾段言論表明得最爲清楚：

「我極力設法激起英國工人舉行示威來援助芬尼亞運動<sup>22</sup>... 過去我以為愛爾蘭脫離英國而實行分立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却認為這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怕分立以後又會要結成聯邦」。——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這樣寫道。

他在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寫的一封信裏又補充說：

「我們應勸英國工人怎樣作呢？我以為他們應當在自己綱領內規定要破裂聯盟」（所謂聯盟是指英國與愛爾蘭聯盟，而破裂聯盟就是指愛爾蘭脫離英國分

\*還請參看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六月三日致恩格斯的信。「... 我讀了泰晤士報駐巴黎記者底通信，得知巴黎人有親波反俄的表示，真使我感覺滿意... 蒲魯東先生和他那個學理主義的小團體，決不能代表法國人民」。

立)，——簡言之，就是載明一七八三年的要求，不過要使其民主主義化而適應於現代的條件罷了。這是解放愛爾蘭的唯一合法的形式，因此也就是英國黨底綱領唯一可以採納的形式。以後的經驗一定會指明：由一個人治理兩國的聯盟制度，是否可以長久存在…

…愛爾蘭所需要的是：

(1) 自治與脫離英國而獨立。

(2) 土地革命」…

馬克思非常重視愛爾蘭問題，他關於這個問題，在德意志人職工會中作過幾次一點半鐘的報告（參看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信）。

恩格斯在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寫的信裏，指出「在英國工人中有仇恨愛爾蘭人的心理」，而差不多過了一年以後（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他談到這個問題時，又寫道：

「從愛爾蘭到俄國 只差一步…拿愛爾蘭歷史為例證，就可以看到，要是一個民族奴役了別個民族，這對於它自己是何等不幸呵。英國一切卑鄙現象都是從愛爾蘭問題中間發生的。關於克倫威爾時代，我還應當去研究，可是無論如何，我認為無疑的，就是假如沒有必要在愛爾蘭實行軍事式的統治和建立新的貴族，那末連英國情形也會呈出另一種局面的」。

我們還要順便指出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日致恩格斯的信：

「波蘭工人因有他們柏林同志底幫助，在波茲南舉行了勝利的罷工。這種反「資本老爺」的鬥爭——雖然是低級形式，即罷工形式的鬥爭，——其能剷除民族偏見，要比資本家老爺們高談和平的聲明厲害得多」。

馬克思在國際內對愛爾蘭問題所實行的政策，可從如下的事實中看出：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他在國際總委員會內關於英國內閣對赦免愛爾蘭人的態度問題，講了一點一刻鐘的話，並提出了如下的決議案：

「議決如下：

格拉斯頓先生在答覆愛爾蘭人要求釋放愛爾蘭愛國份子時，故意侮辱了愛爾蘭民族。

他所提出實行政治大赦的條件，無論對於被惡劣政府所犧牲的人或對於這個政府所代表的人民，都是同樣恥辱的；

格拉斯頓身為政府官吏，以前曾當衆鄭重表示歡迎美國奴隸主底暴動，而現在却來向愛爾蘭民族宣傳消極服從的學說；

格拉斯頓先生對於赦免愛爾蘭人問題的全部政策，都是他先前極力加以揭露，因而推倒了敵黨（保守黨）內閣的那種「侵略政策」底十足表現；

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對於愛爾蘭人民勇敢堅決而高尚地要求大赦的運動表示欽佩；

本決議案應通知國際工人聯合會一切支部及歐美各國所有一切與它有聯繫的工人團體」。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日，馬克思寫道，他在國際總委員會內對於愛爾蘭問題所要作的報告，其內容將如下述：

「英國工人階級直接的絕對的利益，是要它斷絕現在與愛爾蘭的關係，而完全與所謂「替愛爾蘭主持公道」的各種「國際主義的」和「人道主義的」詞句無關，因為「替愛爾蘭主持公道」這點在國際總委員會內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的極深刻的信念，這種信念所根據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國工人說明的。我在許久時期內，都曾認為英國工人階級運動底高漲可能推倒統治愛爾蘭的制度；我在紐約論壇（這是美國報紙，馬克思在很長一個時期向該報投過稿）上始終都擁護過這種觀點。但是我更深刻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以後，却得出了相反的信念。英國工人階級在未擺脫愛爾蘭以前，便一點也沒有辦法…英國內部的英吉利反動勢力，是以奴役愛爾蘭為其根源的」（着重點是馬克思自己加的）。

馬克思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讀者現在應當完全明白了。

「空想的」馬克思竟是如此「不合求實精神」，公然主張愛爾蘭分立，而這種分立在五十年後也還沒有實現。馬克思為什麼採取這個政策？這個政策是不是個錯誤呢？

馬克思起初以為解放愛爾蘭的不是被壓迫民族中的民

族運動，而是壓迫民族中的工人運動。馬克思並不把民族運動看做有絕對意義的東西，明知只有工人階級底勝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各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與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間的各種可能的相互關係（這正是現代俄國民族問題極其困難的地方），是無法預先察知的。

但後來情形改變了：英國工人階級在頗長一個時期內陷於自由派影響下，成了他們的尾巴，因實行自由主義工人政策而割掉了自己的頭腦。愛爾蘭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加強起來而採取了革命的形式。馬克思就把自己的觀點重新審查而加以糾正。「要是一個民族奴役了別個民族，這對於它自己是不幸的」。當愛爾蘭尚未擺脫英國壓迫以前，英國工人階級是得不到解放的。英國反動勢力靠奴役愛爾蘭來鞏固和取得營養（也如俄國反動勢力靠俄國奴役許多民族來取得營養一樣！）。

馬克思在國際中提出了對「愛爾蘭民族」，對「愛爾蘭人民」表示同情的決議（聰明的Л. В. П.大概要大罵可憐的馬克思忘記階級鬥爭了！），鼓吹愛爾蘭應當脫離英國而分立，「那怕分立以後又會要結成聯邦」。

馬克思這一結論底理論前提是什麼呢？資產階級革命在英國一般是早已完結了。但它在愛爾蘭却還沒有完結；只是現在，經過五十年以後，英國自由派的改良才把它完結起來。如果英國資本主義的顛覆，有如馬克思最初所預料的那樣快，那末愛爾蘭就不會有全民資產階級民

主運動了。可是這種運動既然產生出來了，馬克思就號召英國工人去贊助它，給它以革命的推動，爲了本身自由而把它進行到底。

愛爾蘭與英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經濟聯繫，當然比現在俄國與波蘭及烏克蘭等等的聯繫更要密切。當時，愛爾蘭脫離英國分立的「不合求實精神」與「不可實現性」（單就地理上的條件，以及英國擁有極大的殖民地勢力來說），是顯而易見的。馬克思雖是原則上反對聯邦主義的人，但他這次却也容許聯邦制\*，只要使愛爾蘭的解放，不是由改良的道路，而是由革命的道路，由英國工人階級所贊助的愛爾蘭民衆運動來達到就行了。毫無疑義，只有這樣來解決歷史任務，才是最能適應無產階級利益和促進社會迅速發展的。

結果竟不是如此，原來愛爾蘭人民與英國無產階級都軟弱無力。直到現在，才由英國自由派與愛爾蘭資產階級

---

\* 順便說說：不難瞭解，爲什麼從社會民主黨的觀點看來，既不能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爲聯邦制，也不能解釋爲自治（雖然抽象地說來，兩者都是包括於「自決」這個概念內的）。聯邦權根本沒有什麼意思，因爲聯邦制乃是雙方的契約。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在自己的政綱內一般地擁護聯邦主義，這是無待說明的。至於自治呢，那末馬克思主義者所擁護的並不是自治「權」，而是自治本身，作爲具有複雜民族成份以及極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條件的那種民主國家底一般普通原則。因此，承認「民族自治權」，也如承認「民族聯邦權」一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實行一種可憐的妥協分贓辦法，用土地改良（必須繳付贖金的改良）和自治（現時還沒有施行的自治）來解決着愛爾蘭問題（阿爾斯特底實例，表明這是很難於辦到的）。究竟怎樣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馬克思與恩格斯是「空想家」，說他們提出過「不可實現的」民族要求，說他們受了愛爾蘭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芬尼亞運動無疑是小資產階級性的運動）底影響等等呢？

當然不能。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也實行了真正以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教育羣衆的一貫無產階級政策。當時只有這個政策能使愛爾蘭和英國都不致把必要的改革遲延五十年，不致讓自由派爲取悅於反動勢力而把這種改革弄得殘缺不完。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作出了至今還有莫大實際意義的偉大榜樣，表明各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應當怎樣對待民族運動；叫人認識世界各個國家，各個人種和各個民族中那些奴僕成性的市僧，他們一看見有人實行改變某一民族地主資產階級底暴力和特權所造成的國界，就馬上宣佈說這是一種「空想」。

假如當時愛爾蘭無產階級和英國無產階級沒有採納馬克思底政策，沒有提出主張愛爾蘭分立的口號，那他們就會作出最有害的機會主義錯誤，就會是忘記民主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底任務，而向英國反動勢力和資產階級讓步了。



## (九) 一九〇三年的綱領及其取消者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綱領是由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通過的，這次大會底記錄現在已成了非常少見的珍本，所以現今絕大多數工人運動家都不知道綱領個別條文底理由（尤其是因為關於本問題的書籍並不是都能公開傳播…）。因此，必須把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上對於本問題的討論情形分析一下。

首先就要指出，俄國社會民主黨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的文件雖然非常缺乏，但從這些文件中總可完全明白看出，所謂自決權向來都是指民族分立權而言。謝科夫斯基，李勃曼，尤爾克維奇一流的先生之所以懷疑這一點，說第九條意思「不清楚」等等，只是因為他們毫無知識或極不留心而已。還在一九〇二年，普列漢諾夫在曙光雜誌上發表文章擁護綱領草案中的「自決權」條文時，就寫過，這個要求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派是不一定要有的，而「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却是絕對必要的」。普列漢諾夫寫道：「如果我們把它忘記了，或不敢把它提出來，生怕觸犯現今大俄羅斯人底民族偏見，那末我們口裏所喊的「全

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口號…就會成爲一句可恥的騙人謊話了…」。

這是對於擁護這條綱領的基本論據的一個非常中肯的說明，也正因爲它非常中肯，所以那些「忘本的」批評我們綱領的人，總是小心翼翼地迴避它。不承認這一條，不管用何種理由爲口實，在事實上都是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作「可恥的」讓步。既然所講的是一切民族底自決權，爲什麼說是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讓步呢？因爲這裏所講的是脫離大俄羅斯民族而分立。無產者聯合底利益，他們的階級團結底利益，都要求承認民族分立權，——這就是十四年前普列漢諾夫在上述那段話內所承認了的道理；我們的機會主義者如果對這一點稍微思索思索了一下，那末他們關於自決問題，也許不會說出這麼多的荒謬議論吧。

在批准了普列漢諾夫所擁護的這個綱領草案的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上，主要工作是在綱領委員會裏進行的。可惜，綱領委員會底討論沒有記錄下來。而關於這一條的記錄恰巧會是特別值得注意，因爲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底代表華沙夫斯基和甘業茨基只是在委員會內才試圖過擁護自己的觀點，而反對「承認自決權」。讀者把他們的論據（華沙夫斯基底演說，他和甘業茨基地聲明，——見記錄第一三四至一三六及第三八八至三九〇頁）拿來與盧森堡在上述那篇用波蘭文寫的論文中所持的論據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們所持的論據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次代表大會底綱領委員會，——在這裏，普列漢諾夫是駁斥波蘭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發言人，——究竟是怎樣看待了這些論據呢？只是把這些論據無情地嘲笑了一頓而已！向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取消承認民族自決權一項的意見，其荒謬性是被揭示得如此明顯，如此清楚，竟使波蘭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不敢在代表大會全體會議上重複自己的論據！！他們一知道他們的主張在有大俄羅斯人，猶太人，格魯吉亞人，阿爾明尼亞人的馬克思主義者共同參加的全黨最高會議面前絕對通不過的時候，就退出了大會。

這一段歷史軼事，當然是每一個認真注意自己黨綱的人所應特別重視的。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底論據在綱領委員會上完全遭受失敗，他們放棄在代表大會上擁護自己觀點的企圖，——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實。難怪盧森堡在她的一九〇八年的那篇文章內很「謙恭地」隱諱了這一點，大概是因為她回想到代表大會，就覺得太難為情吧！同時，她把華沙夫斯基和甘業茨基在一九〇三年用全體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名義提出，而盧森堡及其他波蘭社會民主黨人都始終沒有敢於（而且現在也不敢）再行提出的關於「修改」黨綱第九條的這一錯誤得可笑的意見，也隱諱過去了。

可是，如果盧森堡為要隱瞞自己在一九〇三年的失敗，所以不肯講出這些事實來，那末關心自己黨歷史的人，却就要設法認識這些事實並思索其意義了。

「…我們提議，——盧森堡底朋友們退出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時向代表大會寫道，——把綱領草案第七條（現在的第九條）寫成如下的文句：第七條——設立保障國內各民族文化發展完全自由的機關」（記錄第三九〇頁）。

總之，波蘭馬克思主義者當時關於民族問題所發表的意見是很不明確的，他們所提出來代替「民族自決」的東西，其實不過是那個鼎鼎大名的「民族文化自治」底別名而已！

這聽起來幾乎很難置信，但可惜這是事實。而在代表大會上，雖然有五個崩得份子共五票，三個高加索代表<sup>23</sup>共六票，而科斯特洛夫底發言權還不計算在內，但結果竟是沒有一票贊成取消民族自決這一條。主張把「民族文化自治」添加到這一條上來的，有三票贊成哥里德卜拉特所提出的條文（「設立保障各民族文化發展完全自由的機關」），有四票贊成李伯爾所提出的條文（「各民族有自由發展文化之權」）。

現在，當俄國自由黨，即立憲民主黨出現了的時候，我們知道，在它的綱領中，是把民族政治自決改成為「文化自決」了。因此，盧森堡底波蘭朋友們，在與波蘭社會黨底民族主義作「鬥爭」時所幹的事情，只是提議把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改為自由派的綱領！而他們還責備我們的綱領是機會主義的綱領哩，——難怪這種責備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底綱領委員會內只是受到哄笑而已！

我們已經說過，出席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沒有一個人反對過「民族自決」，試問這些代表究竟是怎樣瞭解這個「自決」的呢？

記錄中的如下三段話，便可說明這點：

「馬爾丁諾夫認為，決不可給「自決」這個名詞以廣義的解釋；它的意思只是說民族有權實行分立而組成爲單獨的政治整體，而決不是地方自治」（第一七一頁）。馬爾丁諾夫當時是綱領委員會底委員，在這個委員會裏，盧森堡底朋友們所持的論據是受到駁斥和嘲笑的。當時，馬爾丁諾夫按其觀點來說是個經濟主義者，是個激烈反對火星報<sup>24</sup>的人，如果他當時發表的意見是綱領委員會大多數委員所不同意的，那當然是會被駁倒的了。

當綱領委員會工作結束以後，在大會上討論綱領第八條（現在第九條）時，首先就有崩得份子哥里德卜拉特起來發言。

「「自決權」，——哥里德卜拉特說，——是完全不容反對的。如果有一個民族爭取獨立，那我們就不能反對它這樣實行獨立。如果波蘭不願與俄羅斯正式結婚，那就隨它的便吧，——如普列漢諾夫同志所說過的一樣。在這個範圍內我同意這種意見」（第一七五至一七六頁）。

普列漢諾夫關於這一條並沒有在大會上發過言。哥里德卜拉特所引用的是普列漢諾夫在綱領委員會上所說的話；在該委員會上，是把「自決權」當作分立權的意思來

詳細和通俗解釋過了。在哥里德卜拉特發言以後講話的是李伯爾，他說：

「如果某一個民族不能在俄國範圍內生活，黨當然是不會阻碍它的」（第一七六頁）。

讀者可以看到，在通過黨綱的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對於自決「只」是意味着分立權這一點，是不會有兩種意見的。當時，崩得份子也曾懂得這個真理，而只是在目前反革命繼續猖獗而「背叛之風」盛行的悲慘時期，才出現了一些因無知無識而胆大妄為的人，說黨綱意思「不清楚」。可是，在未講到這些可憐的「也是社會民主黨人」之前，我們且把波蘭人對綱領的態度問題作一結束吧。

他們來參加第二次（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是聲明說絕對必須實現統一的。可是，他們在綱領委員會上一遭到「挫折」，就退出了代表大會，而他們的最後幾句話就是載在大會記錄內的書面聲明，其內容就是上面所引錄過的那個主張用民族文化自治來代替自決的意見。

一九〇六年，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加入黨了，無論在加入黨的時候，或是在加入黨以後（無論在一九〇七年代表大會上，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代表會議上，以及在一九一〇年中央全體會議上），都一次也沒有提出過修改俄國黨綱第九條的意見！！

這是事實。

不管人們怎樣花言巧語，但這一件事實總是顯然證明盧森堡底朋友們認為第二次代表大會綱領委員會中的討論

以及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已經把問題完全解決了，證明他們已經默然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改正了它，因為他們在一九〇三年退出大會以後，又於一九〇六年加入了黨，而且一次也沒有企圖用黨性的手續來提出修改黨綱第九條的問題。

盧森堡底文章是在一九〇八年由她自己署名發表的。當然誰都從來沒有打算否認黨的作家有批評黨綱之權，而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同樣也沒有一個波蘭馬克思主義者正式機關提出過修改第九條的問題。

因此，托洛茨基替盧森堡某些門徒撐腰，真是欲益反損，他以門爭報編輯部底名義在第二期（一九一四年三月）上寫道：

「…波蘭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民族自決權」是完全沒有政治內容而需要從黨綱上刪去的」（第二五頁）。

喜歡替人撐腰的托洛茨基真是欲益反損！要不是他作了「私談」（即是播弄是非，這是托洛茨基生平的慣技），那它就會找不到什麼證據來把一般「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算作是盧森堡每篇文章底擁護者。托洛茨基把「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描寫為沒有節操，沒有廉恥，連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黨綱都不會尊重的人。喜歡替人撐腰的托洛茨基真是欲益反損呵！

一九〇三年，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底代表爲了自決權問題而退出了第二次代表大會，當時托洛茨基還能夠說，他

們認為這個自決權是沒有什麼意思而需要從黨綱上刪去的。

可是，自此以後，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又加入了擁有這樣一條綱領的黨，而且一次也沒有提出過修改黨綱的意見\*。

托洛茨基爲什麼在他的雜誌讀者們面前把這些事實隱瞞起來呢？只是因爲他利於藉此投機，挑撥波蘭反對取消派的人與俄國反對取消派的人中間的意見分歧，並在黨綱問題上欺騙俄國工人。

托洛茨基在馬克思主義運動底任何一個嚴重問題上，都未曾有過堅定的意見，只要看見有什麼分歧意見發生，便馬上「乘隙而入」，反覆於兩方面之間。現在他是同崩得派及取消派合在一夥。而這些老爺們對黨是不講客氣的。

請聽聽崩得份子李勃曼所說的話吧：

「俄國社會民主黨」，——這位先生寫道，——  
「十五年前在自己的黨綱內提出了每個民族都有『自決』權的條文時，每個人（!!）都曾問過自己：這個

---

\*有人對我們說，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一九一三年夏季會議上只有發言權，他們對於自決權（分立權）問題完全沒有參發表決，而在發言中一般地反對過這種權利。他們當然有全權這樣行動，並有全權照舊在波蘭宣傳反對波蘭分立。但這與托洛茨基所說的那回事不完全相同，因爲波蘭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要求「從黨綱上刪去」第九條。



時髦(!!)名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問題是從來也沒有得到過回答的(!!)。這一名詞至今還是(!!)個十分模糊的疑團。實際上，當時是難得解開這個疑團的。當時大家都說：現在還沒有到可以把這一條具體化的時候，暫且讓它留作一個疑團吧(!!)。實際生活本身，就會指明這一條應包含有怎樣的內容」。這一個侮辱黨綱的「沒有穿褲子的孩子」<sup>25</sup>，不是漂亮得很麼？

他爲什麼要侮辱黨綱呢？

只是因爲他一竅不通，什麼都沒有學過，連黨史都沒有讀過，却簡簡單單地落到了取消派隊伍中，而在取消派隊伍裏面，對於黨和黨性的問題「照例」是赤身裸體，毫不害羞的。

在波米洛夫斯基著作中，有一個教會學生常以「把痰吐到裝滿了白菜的桶內」<sup>26</sup>而自鳴得意。崩得派先生們更進了一步。他們把李勃曼一流先生們放出來，叫他們來當衆把痰沫吐入自己的桶內。至於國際代表大會通過有某某決議，至於在黨底代表大會上有過崩得自己的兩位代表表現完全能夠瞭解（雖然他們是非常「嚴格」批評與堅決反對過火星報的！）「自決」底意義，甚至贊成自決的事實，這一切又與李勃曼一流先生們有什麼關係呢？要是「黨底政論家們」（請不要發笑吧！）像教會學生那樣來對待黨史黨綱，那不是更容易把黨取消麼？

你們再看另一個「沒有穿褲子的孩子」，即鐘聲雜

誌方面的尤爾克維奇。尤爾克維奇先生大概是有第二次代表大會底記錄在手邊，因為他引了普列漢諾夫所說的那一段由哥里德卜拉特轉述過的話，並且還表現他知道只能把自決解釋為分立權。雖然如此，而他終究在烏克蘭小資產階級中間造謠誣蔑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說他們主張俄國底「國家完整性」（一九一三年第七第八兩期合刊，第八三及其他各頁）。當然，尤爾克維奇一流的先生們要離間烏克蘭的民主派與大俄羅斯的民主派，除了這樣造謠誣蔑之外，是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來的。「鐘聲」社這個文人團體底全部政策路線，就是實行這樣一種離間，鼓吹烏克蘭工人應當分出去而組成爲特別的民族組織\*。

分裂無產階級隊伍的民族主義市僧團體，——而鐘聲雜誌底客觀作用正是如此，——在民族問題上散佈一些極端糊塗的思想，當然是完全相稱的。不待說，尤爾克維奇和李勃曼一流的先生（他們一聽見人家把他們叫作「在黨近旁鬼混的份子」，就氣得「要命」），簡直是一言半語也沒有提到他們到底打算怎樣在黨綱上解決分立權的問題。

你們再看第三個而且是最主要的一個「沒有穿褲子的孩子」，即謝科夫斯基先生。他在取消派的報紙上，當着大俄羅斯民衆面前「大罵」黨綱第九條，同時他又說「有某些理由使他不能贊成」主張取消這一條的意見！！

\*請特別參看尤爾克維奇爲列溫斯基所著加里細亞區內烏克蘭工人運動發展簡史一書所作的序言，一九一四年基也輔版。

這聽來很覺奇怪，但這是事實。

一九一二年八月，取消派代表會議正式提起民族問題。一年半以來，關於第九條的問題，除了謝科夫斯基底文章之外，就沒有看見過一篇東西。而且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反駁黨綱時，又說他「因有某些（莫非是不方便說的病症麼？）理由而不能贊成」主張修改黨綱的意見！！我敢担保說：在全世界上都難找到這種機會主義，甚至比機會主義更壞的背棄黨，企圖取消黨的例子。

至於要知道謝科夫斯基底論據怎樣，那末只要舉出一個例子來看看就夠了。

「如果波蘭無產階級，——他寫道，——想在一個國家範圍內與俄國整個無產階級共同鬥爭，而波蘭社會中的反動階級則與此相反，想使波蘭脫離俄國分立，並在全民公決時獲得大多數贊成分立的票數，那又怎麼辦呢：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中央國會中究竟是要與波蘭同志共同投票反對分立呢，還是爲着不要破壞「自決權」而贊成分立呢？」（新工人報第七十一期）。

由此可見，謝科夫斯基先生甚至不知道這裏所講的是什麼問題。他從沒想一想，分立權的問題，恰巧預定不是由中央國會來解決，而只是由實行分立的那個區底議會（國民大會，全民公決等等）來解決的。

當無論普里什克維奇輩或科可什金輩甚至把分立的念頭都認作是罪惡的時候，公然有人拋開真正實在的具體政

策問題不談，反而像一個小孩那樣發問：如果大多數在民主投票時都贊成反動派，那又『怎麼辦呢』！大概全俄無產階級今天不是要與普里什克維奇輩以及科可什金輩作鬥爭，倒要放過他們，而去和波蘭底反動階級鬥爭吧！！

這類荒謬已極的議論竟寫在取消派底機關報上，而該報底思想領導者之一，就是馬爾托夫先生，就是起草了綱領草案並在一九〇三年努力使它通過了，後來又做了文章來擁護過分立自由的那個馬爾托夫。現在馬爾托夫大概是按如下方式來推論了：

那裏用不着聰明人，  
你們派黎亞德去就行，  
讓我做個旁觀人<sup>27</sup>。

他把謝科夫斯基這個黎亞德派去，讓他在日報上對那些不知道我們黨綱的新起讀者們曲解黨綱，弄出無窮的糊塗賬來！

取消派實在是跑得更遠了，——連許多從前著名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沒有留下一點黨性了。

當然不能把盧森堡拿來和李勃曼，尤爾克維奇及謝科夫斯基一班人等量齊觀，但她的錯誤恰巧為這班人樂意利用的事實，却就特別明顯地證明她是落到怎樣的機會主義深淵裏去了。

## (一〇)結束語

現在讓我們來總結一下。

從一般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看來，自決權問題並沒有什麼困難的地方。一八九六年倫敦大會底決議不容爭辯，自決權只能瞭解為分立權，組織獨立民族國家是一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趨勢，這都是毋庸贅說的。

在某種限度內造成困難的，只是俄國境內被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與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正在共同奮鬥，而且應當共同奮鬥的問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堅持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統一，而反對民族主義所表現的一切資產階級性和黑幫性的影響。在被壓迫民族中間，無產階級組成爲獨立政黨的過程，有時竟會引起與該民族底民族主義作異常激烈的鬥爭，以至使人迷失前途，而忘記壓迫民族底民族主義。

但這樣迷失前途，只能是一種暫時現象。各民族無產者共同鬥爭底經驗，極明顯地指明我們不應當從「克拉科夫城的」觀點，而應當從全俄的觀點來提出政治問題。但統治全俄政治的却是普里什克維奇與科可什金一流人。他們

的思想籠罩一切，他們因異族人抱有「分立主義」思想，懷有分立念頭而對異族人橫施攻擊，在國會，學校，教會和營房裏，以及千百份的報紙上，宣傳這種攻擊，進行這種攻擊。正是這種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毒素瀰漫於全俄政治空氣。奴役其他民族而使反動勢力在全俄鞏固起來的人民，是不幸的人民。一八四九年和一八六三年的事變<sup>28</sup>所遺留下來的那些印象，構成一種活躍的政治傳統，如果不會有很大的暴風發生，這種傳統恐怕還要在幾十年長久時期內阻礙一切民主運動，特別是社會民主運動。

毫無疑義，雖然被壓迫民族（而被壓迫民族底「不幸」，就是民衆往往沉醉於「自己」民族解放底思想）中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所持的觀點往往使人覺得合理，但在事實上，就俄國階級力量底客觀對比來說，拒絕擁護民族自決權，就等於最兇惡的機會主義，就等於拿科可什金輩底思想來腐化無產階級。而這種思想，其實也就是普里什克維奇輩底思想與政策。

因此，如果說最初一個時候，還可以把盧森堡底觀點當作是波蘭的，「克拉可夫城的」一種特殊狹隘觀點\*而

\*當然，全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是大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承認民族分立權，絕不排除某個被壓迫民族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去宣傳反對分立，也好像承認離婚權並不排除宣傳反對某個離婚事件一樣。所以我們認為，波蘭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定會相繼奮起，恥笑謝科夫斯基與托洛茨基現在所「煽動起來的」那種莫須有的「矛盾」的。

加以寬恕，那末到了現在，當民族主義，尤其是政府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到處加強起來了的時候，當這個民族主義已在指揮政治的時候，這樣的狹隘觀點却就成爲不可寬恕的了。其實，現在所有一切民族中的機會主義者都極力利用這種狹隘觀點，逃避『風暴』與『突變』思想，認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終結，而傾向於科可什金一流人底自由主義。

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也同任何民族主義一樣，定會經過幾個不同的階段，而視資產階級國家內部以那些階級佔首要地位爲轉移。一九〇五年以前，我們差不多只知道有民族主義反動派。革命以後，在俄國却產生了民族主義自由派。

其實我國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科可什金），即整個現代資產階級，都是站在這個立場上。

往後就必然會產生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民主派。『人民社會黨』創始人之一的壁舍浩諾夫先生，在一九〇六年俄國財富雜誌八月號上叫人小心對待農夫底民族主義成見的時候，就表示了這種觀點。不管人家怎樣誣譏我們波爾什維克，說我們把農夫『理想化』，可是我們向來都嚴格地分清，並且以後還要分清農夫底理智與農夫底成見，農夫反對普里什克維奇的民主主義立場與農夫想同牧師地主調和的傾向。

無產階級民主派現在就應當顧到大俄羅斯農民底民族主義（不是對它讓步，而是要同它作鬥爭），而且將來大

概還要在頗長一個時期內顧到這點\*。一九〇五年以後，被壓迫民族中的民族主義潮流表現得非常厲害（例如第一次杜馬中的「自治聯邦派」，烏克蘭運動，回民運動之增長等等），這種潮流一定會使城鄉大俄羅斯小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加強起來。俄國民主改革進行得越慢，各族資產階級底民族迫害和爭執也就會更加頑強，更加粗魯，更加殘暴。同時，俄國普里什克維奇輩底特別反動性將會在那些常在鄰國境內享有較多自由的被壓迫民族中間引起（並加強）「分立主義的」趨向。

這種實際情況就使俄國無產階級負有兩重的，或正確些說，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反對一切民族主義，首先是反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不但要一般地承認各民族有完全的平等權利，而且要承認國家建設方面的平等權利，即民族自決權，民族分立權；另一方面，正是爲了與一切民

\* 例如，把波蘭民族主義變化的情形，由貴族民族主義變成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然後又變成爲農民民族主義的經過情形考察一下，是很有趣味。彼恩加德在他用德文寫的普魯士境內的波蘭人一書中（有俄譯本），自己站在德國的科可什金派底立場上，而描寫了一種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德國境內的波蘭人組織了一種「農民共和國」，其表現就是波蘭農民的各種合作社及其他種種團體都緊密團結起來爲民族，爲宗教，爲「波蘭人的」領土而鬥爭。德國人的壓迫把波蘭人團結成爲一個單獨的團體，因爲德國人的壓迫在波蘭人中間，起初是在波蘭貴族中間，後來是在波蘭資產階級中間，最後是在波蘭農民羣衆中間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思想（特別是一八七三年德國人開始反對學校內教授波蘭文以後）。在俄國也有這種趨向，而且不僅以波蘭區域爲限。



族中的各種民族主義作順利的鬥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鬥爭以及無產階級組織底統一，使其不顧資產階級底民族孤立傾向而極密切地溶合爲一個國際整體。

各民族完全平等，民族有自決權，各民族工人溶合起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教導給工人們的民族問題綱領，全世界經驗和俄國經驗教導給工人們的民族問題綱領。

\*                     \*                     \*

在本文已經排好了版的時候，我忽然收到了我們的工人報第三期，科索夫斯基在這裏論到承認一切民族有自決權的問題時寫道：

「這個條文是從第一次黨大會（一八九八年）決議中機械抄來，而第一次黨大會又是從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決議中借來的。從當時討論情形中可以看出，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對於這個條文，正是按社會主義國際所賦予它的那種意思來解釋的：解釋爲政治自決，即解釋爲民族在政治獨立方面的自決。所以，民族自決這一條文既然是指領土獨立權而言，當然也就完全沒有涉及究應怎樣在某一國家機體內部調節那些不能或不願退出現存國家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

由此可見，科索夫斯基先生是有一九〇三年第二次代表大會底記錄在手邊，並且很清楚知道民族自決這一概念底真正（而且是唯一）意思。請你們拿這件事實去同崩得

時報編輯部放出李勃曼先生來侮辱綱領並宣稱綱領意思不清楚的事實比照一下吧!! 崩得會員先生們那裏的「黨性」道德，真是奇怪得很…至於科索夫斯基究竟爲什麼硬說代表大會通過自決條文是機械的抄襲，那就只有「鬼才知道」了。常有一些人，只是「想要反駁一下」，至於究竟用什麼來反駁，怎樣來反駁，爲什麼要反駁以及爲了什麼而反駁，那他們是根本不知道的。

一九一四年刊載於教育雜誌第四，第五，第六等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十七卷，第四二五至四七四頁

## 簡要註釋

<sup>1</sup> 教育雜誌是波爾什維克在彼得堡公開出版的理論刊物，一九一一年末創刊，一九一四年七月停版。一九一七年秋季復刊後，只出版過一期，上面登載有列寧所著波爾什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一文。——（見正文第七頁）。

<sup>2</sup> 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失敗後的反動年代，孟什維克力求取消無產階級底革命祕密政黨，並為獲得工人合法「公開」政黨存在權而放棄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綱領和策略，因被稱呼為取消派。他們在民族問題上擁護了崩得所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口號（參看註<sup>3</sup>）。——（見正文第七頁）。

<sup>3</sup> 崩得，即「立陶宛，波蘭和俄國猶太工人總同盟」，成立於一八九七年，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反映着工人運動中的小資產階級傾向。它要求黨按聯邦主義原則，即按民族標誌實行改組而承認崩得為猶太無產階級唯一代表。崩得在一九〇五年提出所謂「民族文化自治」要求，列寧認為這是使各族無產者彼此隔離的一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反動要求。列寧，斯大林，波爾什維克黨進行了堅決反對崩得民族主義的鬥爭。——（見正文第七頁）。

<sup>4</sup> 盧森堡（一八七一——一九一九）是波蘭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卓越活動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熱烈的革命家，始終努力為工人階級事業鬥爭的戰士。列寧非常重視盧森堡對於國際工人運動的功績，但同時又嚴厲批評了她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許多重要問題上，特別是在民族問題上的半孟什維克主義的立場。——（見正文第七頁）。

<sup>5</sup> 社會民主主義評論 („Przegląd Socjal-Demokratyczny“) 是波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底理論刊物，一九〇二至一九一〇年間在克拉科夫城出版。——（見正文第一一頁）。

<sup>6</sup> 見馬克思所著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五章現代的殖民政策論內的附註。——（見正文第一二頁）。

<sup>7</sup> 杜魯別茨可義（一八六三——一九一九），是俄國帝國主義思想家之一，是自由主義君主派的立憲民主黨黨員。

俄國思想是自由主義民粹派的月刊，從一八八〇年起在彼得堡出版；一九〇五年革命後成了立憲民主黨機關報。——（見正文第二〇頁）。

<sup>8</sup> 黑幫，即「黑百團」，是沙俄極反動的一種保皇團體，因其專幹蹂躪民衆的黑暗勾當，故有此稱。——（見正文第三〇頁）。

<sup>9</sup>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政府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而頒佈新的第三屆國家杜馬選舉法，把工農本來極端有限的權利更加削小了，於是這天就被稱爲六三政變日。沙皇政府當時取消了它自己宣佈的憲制權利，並將第二屆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人代表判處了苦役流刑。六三政變是反革命勢力底暫時勝利，亦即俄國所謂「六三制度」底開始。——（見正文第三四頁）。

<sup>10</sup> 十月黨人，即十月黨（「十月十七日同盟」）黨員，是代表大工業資本和按資本主義方法經營的大地主利益的。他們口頭上承認沙皇被革命嚇倒時答應給予民衆公民權的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宣言，但事實上根本沒有想要限制沙皇專制權力。他們是完全擁護沙皇政府內外政策的。——（見正文第三四頁）。

<sup>11</sup> 真理報是波爾什維克公開出版的日報，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曆五月五日）在彼得堡創刊，其組織者和領導人是列寧和斯大林。真理報常受沙皇政府取締，屢遭封閉，但接着又用工人真理，無產階級真理等等新名稱繼續出版。從一九一八年三月起，真理報就以蘇聯共產黨（波）中央和莫斯科委員會機關報資格出版了。——（見正文第三四頁）。

<sup>12</sup> 工人真理報，詳見註<sup>11</sup>——（見正文第三五頁）。

<sup>13</sup> 無產階級真理報，詳見註<sup>11</sup>。——（見正文第三六頁）。

<sup>14</sup> 新時代報是反動貴族和官僚底機關報，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七

年十月間在彼得堡出版，它不僅進行了反對革命運動的鬥爭，而且進行了反對自由主義資產階級運動的鬥爭。

地方自治局日報是黑幫派的報紙，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在彼得堡出版。——（見正文第三八頁）。

<sup>15</sup> 普里什克維奇（一八七〇——一九二〇），是個大地主，激烈君主派和反動派份子，黑幫俄羅斯人民同盟創始人。——（見正文第三八頁）。

<sup>16</sup> 「只捉不放」是句表徵警察專橫特色的成語，是從俄國作家烏斯片斯基描寫典型巡警美穆列曹夫的短篇小說崗位中借用來的。美穆列曹夫盡職過火，動不動就把小百姓「捉」到警察局去。——（見正文第三八頁）。

<sup>17</sup> 基也輔思想報是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報紙，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八年二月間在基也輔出版。——（見正文第四〇頁）。

<sup>18</sup> 巡警美穆列曹夫，詳見註<sup>16</sup>。——（見正文第四一頁）。

<sup>19</sup> 這是人們給予烏克蘭分離派民族主義者的一種稱呼，得名於烏克蘭首領馬齊伯（約在一六四四年生，一七〇九年歿），因為他曾力圖使烏克蘭從莫斯科國方面分離出去。——（見正文第四一頁）。

<sup>20</sup> 前進報是加里西亞和西利西亞境內波蘭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從一八九二年開始在克拉科夫出版。——（見正文第四六頁）。

<sup>21</sup> 蒲魯東主義的斯底納思想，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得名於無政府主義派底兩個著名思想家和理論家，即蒲魯東（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和斯底納（一八〇六——一八五六）。——（見正文第六二頁）。

<sup>22</sup> 芬尼亞運動發生於一八五七年，是主張愛爾蘭脫離英國分立的運動。芬尼亞革命團體曾在愛爾蘭和美洲同時活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組織了要求救免被監禁芬尼亞份子的國際運動。——（見正文第六三頁）。

<sup>23</sup> 高加索代表是以格魯吉亞孟什維克首領饒爾丹尼亞（他的假名

是科斯特洛夫)爲首而代表高加索社會民主黨組織出席的。——(見正文第七三頁)。

<sup>24</sup> 火星報是列寧在一九〇〇年末創立的第一個全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機關報，在國外創刊並祕密運往俄國散佈。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的列寧火星報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造成了創立俄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基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即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閉會後不久，火星報就轉到孟什維克手裏去了。——(見正文第七四頁)。

<sup>25</sup> 「沒有穿褲子的孩子」是薩爾退可夫—謝德林所著在國外記事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見正文第七八頁)。

<sup>26</sup> 是指俄國作家波米洛夫斯基所著中篇小說教會學生一書而言。在這本書中揭露了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於俄國教會學校的荒謬教育制度和野蠻習俗。——(見正文第七八頁)。

<sup>27</sup> 這是從克里木戰爭時期士兵小調裏引來的一段話，據說這個小調是列夫·托爾斯泰作的。小調用意是暗示黎亞德將軍指揮的俄軍部隊失利的動作。——(見正文第八一頁)。

<sup>28</sup> 一八四九年事變是指俄皇尼古拉第一軍隊幫助匈牙利反動勢力鎮壓匈牙利革命而言；一八六三年事變是指沙皇政府粉碎波蘭人民起義而言。——(見正文第八三頁)。